

經濟工作手冊

行印在書北東

經濟工作手冊

1949. 5. 初版 共 1-5000.

基本定價：270元

82 40

經濟工作手冊

東北書店印行

經濟工作手冊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大連。

1949. 5. 初版 長. 1—5,000.

目錄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一
論合作社	七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一〇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二五
掌握布爾塞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	三四
黨的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成功的基礎	四〇
政治工作是鞏固經濟成績的條件	四七
蘇聯企業經理與職工會的相互關係	五三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	五六
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制度	六三
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六六
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	八一
蘇維埃威力底經濟基礎	九一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毛澤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在陝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上的講話——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

你們開了十幾天大會，總結了很多的與很好的經驗，大家歡迎你們，尊敬你們。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種作用。第一個，帶頭作用。這就是因為你們特別努力，有許多創造，你們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範，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學習你們，你們是生產運動和各項建設工作的帶頭人。第二個，骨幹作用。你們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幹部，但是你們已經是羣衆中的骨幹，羣衆中的核心，有了你們，工作就更好推動了。到了將來，你們可能成爲幹部，你們現在是幹部的後備軍。第三個，橋樑作用。你們是上面領導人員與下面廣大羣衆之間的橋樑，羣衆的意見經過你們傳到上面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下去。

你們有許多好處，有很大功勞，但是你們切記不可驕傲。你們被大家尊敬，是應當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驕傲。如果你們驕傲起來，不虛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幹部，不尊重羣衆，你們就會當不成英雄與模範了。過去已有一些這樣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學他們。

你們的經驗，這次大會做了很好的總結。這個總結文件說得很好，不但這裏適用，各地也可以適

用，我就不講這些了。我想講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

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皖甘寧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及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給，並有盈餘，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成績。到了那時，才算學得更多，學得更好。如果那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爲着反攻而準備的物質基礎還不鞏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上漲，而是停止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那個地方的軍政黨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那個地方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於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農村，這一點好像並沒有什麼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處在農村中呢？其實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爲瞭解農村，但是他們並沒有瞭解農村，其中有些人至少是瞭解得不深刻。他們不從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在前方）農村環境這一點出發，他們就在處理政治問題上，在處理軍事問題上，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在處理文化問題上，在處理黨務問題上，在處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問題上，常常不適當，或不大適當。他們帶着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幾年來，由於整風，由於工作中碰了釘子，使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進步。但是還須注意，還須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摸樣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瞭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來收效很慢，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作

效果會怎麼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現實，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種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即如果我們提倡採取現有模式的軍民生產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如果我們要從農村根據地上打退強大的日本侵略者，並且要準備攻入城市，收復一切失地，這就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準備長期戰爭。抗戰已有八年了，農村的財富，被敵人摧殘，我方消耗，都是很大的。但是我們還要堅持戰爭，並且還要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然後才能把日本人打出去。在這種堅持戰爭與準備反攻的工作中，除了軍事、政治、文化等項以外，物質力量的準備，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了。沒有這個條件，現在的堅持與將來的反攻，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是處在個體經濟的被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同盟國出力，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外國人幫助。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那末，有些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用軍民兩方面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由於是農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們的生產和供給就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

由於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後的生產工具，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爲了提高生產興趣與生產力，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與組織互助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互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興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這裏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當成了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當成了一萬萬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當成三個人的。如果不採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採取

「耐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或全體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與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裏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爲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及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綫，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及日用品，以爲反攻敵人之用。

不但要組織農民生產，而且要組織部隊機關一齊生產。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機關就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部隊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拿我們邊區說，部隊機關每年需細糧（米）二十六萬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萬担，自己生產的佔十萬担，如果不自己生產，則軍民兩方，勢必有一方要餓飯。由於展開了生產運動，現在我們不但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面都吃得很好。我們邊區的機關，除糧食被服兩項之外，其他用費，大部自給，有些單位則全部自給。另有許多單位，並且自給一部份糧食，一部份被服。

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其他一切，全部自給，即自給百分之一百，不領政府一點東西。這是最高的標準，這是第一個標準，是從幾年之內逐漸達到的。

前方要作戰，不能採取這個標準。前方可以設立第二、第三兩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除糧食，被服兩項由政府供給之外，其他如油（每日五錢）、鹽（五錢）、菜（一斤至一斤半）、肉（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費、辦公費、雜支費、教育費、保健費、擦槍費、旱烟、鞋子、襪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產自給，約佔全部用費百分之五十，可在兩年至三年內逐漸做到。現在已有做到了的。這個標準，在鞏固區內可以實行。

第三個標準，是在邊沿區及游擊區內實行的，他們不可能自給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這樣，也就很好。

總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隊、機關，於戰鬥、訓練與工作的間隙，一律參加生產。部隊及機關，除利用戰鬥、訓練及工作的間隙，集體參加生產之外，應組織專門從事生產的人員，創辦農場、菜園、牧場、作坊、小工廠、運輸隊、合作社，或與農民夥種糧、菜。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聲氣，那是可恥的。但須規定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能够分得紅利，藉以刺激生產的發展。又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方能有效地推進生產工作。

有人說：部隊生產，就不能作戰與訓練了，機關生產，就不能工作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豐足，同時又進行大練兵，又有政治與文化學習，均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與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進行了大規模生產運動，可是去年一年作戰方面有很大的成績，並且普遍的開始了練兵運動。機關因為生產，生活改善了，使得工作人員更安心，更有工作效率，邊區和前方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機關、部隊，如果有了生產自給運動，他們的戰鬥、訓練與工作，就更有勁，更加活躍了。他們的紀律，他們的內部團結和外部團結，也就更好了。這是我們中國長期戰爭的產物，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學會了這一條，我們就對一切困難都不怕了，我們將一年一年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

但是，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方開闢不久，還頗富足，但是那裏的工作人員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很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會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敵人走了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關於工業品，陝甘寧邊區決定於兩年內，做到花、紗、布、鐵、紙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給。原來根本沒有，或出產很少的，現在一概自種自造自給，完全不靠外面。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社經營三方面完成任務。一切產品，不但求數量多，而且求質量好，耐穿耐用。邊區政府、聯防司令部、西北局，對於這些抓得很緊，這是非常之對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這樣做。有許多地方，他們已是這樣做了，希望他們得到成功。

我們邊區及整個解放區，還要有兩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完全學會全部經濟工作。我們到了糧食與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造自給，並有盈餘的日子，就是我們完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日本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論合作社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邊區高幹會的講話——

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羣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在過去，束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

但是，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爲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

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全邊區現有全勞動力三十五萬個，今年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中的變工隊札工隊的已有三萬餘人，佔全勞動力總數十分之一，而臨時性的勞動互助，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還可發展。如果各縣經常的集體勞動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達十萬人左右，再加上臨時性的勞動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齐，還有半勞動力也參加組織，這將是一支很大的勞動軍。

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帶着合作社的性質。比如一個連，就是一個小合作社，一個旅就是一個大合作社。在各種部隊機關學校合作生產之中，楊家嶺運輸隊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楊家嶺運輸隊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應運輸物品二十七萬斤，但實際運輸的只有十九萬斤。經費開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今年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運輸隊改為運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後增為二十頭）及全部用具作為八十股，運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義作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數二八分紅；一切人員，牲口，添置等費用開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決；若公家運輸物品依照里程遠近按斤給運費，運輸員的生活，由運輸合作社適當改善。這辦法，經過解釋後，全體運輸員一致贊成。執行結果，運輸量由每個月十九萬斤，增為三十八萬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過了普通的運輸力百分之三十。同時，大大提高了運輸員對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性，節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又更加愛護牲口。比方，過去裝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無人管，現在運輸員隨身帶着針線，縫補口袋；過去貪污馬料是公開秘密，現在却沒有這種貪污了；過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壞，就要求公家補充新的，現在只要能湊合着用，就對付着用下去；對牲口，過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餵好了；運費開支，改組後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過

去除照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還每月獲利數萬元。

各機關採用這辦法後，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織合作社之前，每月運輸量只有一百二十萬斤，改組為合作社後，每月運輸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於我們的公營工廠及公營農場。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為我們不以剝削人民為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軍隊中如三五九旅戰士的紡毛織，用柳榆樹條編成各種用具，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則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時無異增加了戰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為羣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羣眾，為羣眾打算，把羣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想問題從羣眾出發而又以羣眾為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雜務人員着想。這種羣眾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破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為羣眾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好。

我願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的集體互助勞動又是一種合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稱為運輸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樣式的合作社都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羣眾就會變為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也就能够克服了。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陳伯達

——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寫的一個題目。毛澤東同志在那裏所寫的是關於軍事問題。從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實際看來，我們全黨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已經大體上學會了戰爭，雖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不能自己滿足，還需要繼續學習，要學習得更多，更好。除了在軍事這一方面應該繼續學習之外，顯然，今天我們特別要提出來學習關於經濟的工作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很久以來，毛澤東同志即號召我們學習這兩項工作，我們過去也學習過一些，做過一些工作，並且有過創造，以至是重要的創造；因此，在許多最艱苦的年月，我們渡過了許多經濟的難關，提高了羣衆政治的覺悟。這類成績，是不能够磨滅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承認：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仍然是極端幼稚，有時簡直幼稚得可笑。這是不足怪的：第一，因為我們黨絕大多數的優秀幹部，二十幾年來一直爲軍事與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而不是在這些方面。當然，在經濟與文化的方面，我們也有優秀的幹部，但比起軍事與政治的方面來是太少了。第二，因為我們執政的地區，過去大都是較偏僻的農村環境，大工業很微末，商業鬭爭的問題是存在了的；但是，一般說來，經濟情況比起現在要簡單多了。同樣地，文化教育的情況也是比較簡單的。因

此，過去的經驗是很不够用的。而且，經驗總是兩方面的，有正確的經驗，也有錯誤的經驗，我們許多同志沒有認真去學習這種種過去的經驗，也沒有認真去領會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種經驗的總結；因此，在新的環境下，一方面就可能不會利用過去的正確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可能再犯過去的錯誤。

我們共產黨員，正如斯大林的名言：「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不能夠學會的，絕對不是不能夠學會，而是「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只要我們能夠遵守毛澤東同志的教訓而善於學習，那末，我們也就會像在軍事戰綫上的百戰百勝一樣，我們在經濟戰綫上與在文化教育戰綫上仍將贏得百戰百勝。

沒有任何人（連我們的敵人在內）能夠懷疑我們在軍事上將在全國勝利。我們在全國勝利，澈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早經確定的了。但是，全國人民不只是需要我們在軍事上有本領，而且需要我們在經濟工作上，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有同樣的本領。特別關於經濟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上面，就嚴重地警告過我們：「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模模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歡宴職工代表會上，毛澤東同志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已說了好多年，到了現

在，人民是更迫切地需要我們在這方面的本領了。過去因為所處的條件，我們這些方面的本領雖然差些，也還沒有特別顯出迫切的危險性來，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已擁有，並且將繼續擁有大城市與工業區，我們將擁有全國、特別是大部份解放區已消滅了封建，而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即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公營企業已日有增加，並且將日益增進其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雖然它今天在經濟上的比重還是很弱小的），如果我們——人民首腦的共產黨員——還不去特別努力學習，真正學會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那末，即使我們軍事上在全國完全勝利了，我們也還可能在經濟上競爭不過別人，也還可能變成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本年三月間，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是一個從鞍山出來的工程師的投稿，裏面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們，措辭很不禮貌，其中有幾句話，說是：「……對於農村，他們（按：指我們共產黨人）是駕輕就熟，很有辦法。對於都市，尤其一個工業城市，顯然生疎得很。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人材，但是鞍山的共黨當局却不知道收羅人材……」。大家知道：大公報是一個親國民黨而經常敵視我們，反對我們的報紙，該稱作者也沒有摸透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但是，我們暫且不管這些，上述的幾句話，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並不怕那反對我們的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也不管人家對我們的措辭禮貌不禮貌；我們所怕的，就是我們不敢正視我們自己的弱點，不肯用力去克服自己的弱點。事實上，在工業城市方面，我們固然「生疎得很」，就在農村方面，我們也不能驕傲自滿，我們也有生疎的東西，我們是有許多東西繼續要學習的，如果學習得還不够，我們在農村中也還可能犯錯誤，如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指責了我們曾經在農村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錯誤。

在新鮮事物面前，或在生疏的事物面前，誰要賣什麼「革命老資格」，自稱「英雄」，誰就要碰得皮破血流。這真是無情得狠的。不管你過去的歷史多末光榮，但在這裏不求長進，就成爲落伍者。

沒有什麼是可以「生而知之」與「不學而能」的，也沒有什麼是有學够的時候，向誰學習呢？我們的先生是到處可以找到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論學習的時候曾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先生多得——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對於我們今天各部門的工作仍然保存了全部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向各種羣衆學習，向同盟者學習，以至向敵人學習。當然，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是要囫圇吞棗的學習，而是要批判的學習。

由於我們在經濟工作上還不善於學習，還沒有學會很多（當然是從一般來說），我們已嘗過了不苦頭。特別是三四年來，我們革命的局面擴大了，經濟的事情更多更複雜，而我們的進步不够，甚至有的就把舊的狹小的經驗亂套一頓，我們的苦頭也就嘗得更多，吃虧更大。不少多財善賈的商人，利用我們小生產經濟分散的弱點，還企圖耍弄投機和操縱市場的舊把戲，並且因爲我們善良，因爲我們對這類行業還不精明強幹，他們就欺侮了我們。當然，那些躲在我們領導的公營工業或公營商業的機構內的壞人也欺侮我們老實，覺得我們只會幹政治，不會幹經濟，就把我們的老實看成傻瓜，而甚至發現過這樣的事情，即可以一手把我們的公家貨物從後門運出，另一手就把這些貨物送進前門來賣給我們，同時繼續向我們領取他的薪水。因爲我們的生疏。在工業中我們有些同志曾經做過很多荒謬絕倫的事情，不管我們領導的公營工廠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些工廠却是在賠本的情況下過日子，競爭不過私人資本，以至於不但是工人，而且也使那些存心的確良善，願意幫助人民事業發展的

工程師，技師或善於管理企業的職員，也要為我們搖頭，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還太過於幼稚。

從客觀上說來，我們犯過的許多錯誤，在一定時候是很難避免的，甚至於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事本沒有做過，開頭要做，也就可能錯誤百出。然而經常錯了不改，這就是我們所不可允許的了。我們必須努力改造我們自己。

x

x

x

爲了能够充分說明毛澤東同志關於「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一個重要的方針，這裏要特別介紹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時期，關於共產黨人要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許多極寶貴的語言。雖然現在我們和蘇聯是處在不同的革命性質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但是，如上所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並存着，而隨着革命局面的擴大，官僚資本的企業越多落入我們之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同時我們又還而對着極廣大的散漫小生產者的經濟，因此，我們正遇到有重大歷史關係的複雜的經濟問題，而列寧這些關於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語言，就好像就是對我們而說的。列寧這一切語言不只是對我們學做生意有益，而且對我們學做各項經濟工作同樣有益。

列寧說：「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商，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事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情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冶金工人聯合會全俄代表大會共產黨團會議上的報告）

列寧說歷史是會寬恕我們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的，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列寧告訴我們：不要在錯誤面前盲目起來。列寧說：

「……最主要的是，要能冷靜地會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裏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末，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成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處理我們在世界最偉大的任務的。」（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就是說：我們對人民負責，負有歷史上偉大的任務，要去掉偏見，要冷靜地找到錯誤的根源，敢於改正錯誤，從頭重新地做起。列寧說：

「如果一切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結論。」（同上）

善於學習，則我們一定勝利。這就是列寧的結論。

列寧曾經反覆地描寫了當時俄國解放之後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共產黨人的批評與期待：

「……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末，我們就等一等，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的。應當知道：這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兌現（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親愛的統治者們，你們在延期這末多月和這末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够有所作為的，這一點，你們也曾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歸根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命運的。」（同上）

「資本家是會辦供給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的，他們侮辱了我們，他們掠奪了我們。那般不知共產主義是何物的單純工人和農民，都是知道這個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會辦供給的，你們會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們所負擔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有很多工人——在去年（按：指一九二一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調最致命的批評。……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併肩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地活動着，他們唯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試用新的方法作一下吧：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為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允許共產黨人延期兌現，已經有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曾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大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

（同上）

二十五年前列寧所描寫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當時在經濟工作上還很生疏的蘇聯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與期待，現在在我們這裏，也正是遇到了。我們正遇到着類似的批評與期待。很多人批評我們，

覺得不但商業，而且工業，資本家要比我們會搞。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在幫助他們從封建半封建及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後，能够更「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辦法」，繼續幫助他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我們這裏的農民也期待我們能多供給他們一些物品，期待我們善於把工業和農業聯繫起來，善於把農民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使他們避免投機商人買賤賣貴的壓迫；希望我們要善於和破壞國民經濟的投機商鬪爭。我們這裏的農民也相信我們是能够這樣做的，因為在我們領導之下，他們已親身經驗根本的利益，並相信我們對人民事業的忠心，相信我們的能力。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翻天覆地的最能幹最了不起的中國人物，都知道我們什麼都能够學會，並會學得比別人高明，以至可能高出萬倍，只要我們肯學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能幹的話，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在我們解放區，不論工人，農民，或其他人民，除了高興我們已經兌現的東西之外，對於其他還沒有兌現的東西，也是期待我們不要拖延時間太久，而且是更快地兌現。當然，我們一些根本的辦法是有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同樣地早已指出了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繼續解脫農民貧困的道路，可是我們很多地方不會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去做，不會具體化，或者做得很粗魯，做得很不切實際，很不耐心，所以就延長了兌現的時間。

毫無疑問：我們也正在碰到試驗，在整個經濟戰線上（包括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的試驗，而這個試驗將要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命運以及將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命運。

毫無疑問：蘇聯共產黨員在列寧與斯大林的指導之下，結果是學得那末出色，做得那末驚天動地，那末，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一定不會辜負我們中國人民的期待，凡是蘇聯

共產黨員能够做到的，我們便也可能同樣做到，而根本的條件，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能够像蘇聯共產黨人那樣善於學習。

列寧認爲必須三番四覆地學習，學了不會又學，學了不會又學，一直要達到目的。

「我重複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裏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政治期票和普通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爲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爲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人的自負心在這裏還依然存在着。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最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心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却不會做買賣，因爲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ABC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爲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爲四十個金字塔所注視，則無論如何是爲歐洲四十個國家所注視）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革命家，却不僅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不知道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末這將是一件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懂得這一點，以後應從ABC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

（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够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從頭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曠工了，那末你再重新開始，那怕十次改作，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為止。不要因為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裝腔作勢，而再自高自大，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吧——很善於從事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却是不會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為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按：指一九二二年），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小不足道的。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的這種本領，比任何一個舊式的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們必須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來舉行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繫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場來舉行的……這一考試是極嚴格的，因為在這裏，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同上）

顯然，列寧告訴了我們：首先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廣泛的認識和覺悟（聽呵，是廣泛的認識呢，是廣泛的覺悟呢），知道了在這經濟工作方面我們比別人不行，而後我們才會去認真地學習，而後我們的考試才會合格。

因為社會主義與私人資本的「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社會主義必須能够經得起十分痛苦的財政危機的考試，經得起內外市場的考試，當時列寧是這末警告的：「這一考試是嚴格的，因為在這裏，

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

列寧指出了管理事業的技能與文化程度是相關聯的：

「這裏，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裏？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充分的。這裏未必有人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事務機關當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裏。……缺少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同事的那部份共產黨員的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為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例，那末我們就要問一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否能夠說：那些共產黨員是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裏發生的事情，正如同童年時代人家講給我們的歷史故事，人家教我們說，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的文化如何呢？在這裏，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高於戰敗民族，則前者迫使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迫使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按：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戰敗的漢族結果迫使戰勝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諸族接受漢族的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萬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他們全體又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了他人的文化呢？是的，在這裏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為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少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

貧窮，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這些共產黨員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怠工者們故意巧妙地迎合他們，以利用他們作為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爲這一點是必須加以承認的，因為在現時，這正是問題的焦點所在。……

「蘇聯與俄國共產黨的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爲是領導人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末他們自然就能够學習，因為這是能够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希望的相去甚遠。」（同上）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我們是沒有法子不承認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別人要低些，在我們中國，這事實是同樣明顯的。雖然在我們這裏，地主階級也罷，資產階級也罷，它們的文化程度，是更加可憐，更加渺小，但是還是像列寧所說的一樣：「它比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為我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這樣，我們是不可能依靠發命令出佈告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需而且也只能依靠學習來解決問題。在這裏，驕傲就會是過盡以至滅亡。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列寧「論糧食稅」即已指出：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曾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一樣。「學習」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够

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寫這些話過了約近一年，列寧又說：

「如果共產黨人能够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己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時，那我們便能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爲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前綫擄殺過，並且還不是同這樣的人擄殺哩，——正是這種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同上引在聯共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因此，列寧指出了要善於與非黨人員合作。

「……務須辦到這一步，即：使那些與我們合作並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倍的大批分子，能够這樣來進行工作，以便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的中心關鍵就在這裏，因爲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已經理解了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的廣大羣衆對吸引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認識。……」

完全可以明白：列寧當時的這些意見是適用於現在的我們的。

我們要善於學習，要學習使自己會建設經濟；要學習在公營企業中，在合作社企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非黨的專門家合作，善於向他們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和暗害的特務分子、破壞分子及怠工者作鬭爭；要學習在建設整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事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那些擁護新民主主義政權、經營正當營業而能够並有能力組織生產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經濟的聯盟與經濟的共處，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與那些經營投機事業而破壞國民經濟建設的「不文明的資本家」作鬭爭。抽

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必須盡量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創造積極性的。正如列寧「論糧食稅」的結論上所說過的：「在振興農業與工業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的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是各式各樣的。」

如果有人擺起官僚架子，表現官僚習氣，既不善於學習這樣，也不善於學習那樣，而辦起事來一場糊塗，那就該怎樣辦呢？列寧主張把他交給法庭，加以審判和禁閉。列寧指出：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是好的，可是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因循苟安，亂雜無章，胡衝亂撞。列寧說：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漂亮地告訴你關於革命鬥爭，關於全世界鬥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誠實，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誠實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專業的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那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懲辦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訴，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担保，在這一件事（按：列寧指當時一個向外國購買食品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務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

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

列寧所責備的那種從事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的人，也就是我們這裏平常所指的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與煩瑣的事務主義者。在我們解放區，同樣地是如列寧所指出的：「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中斷。」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經驗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變成「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呢？除了善於學習又學習，以便提高自己管理事業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使得我們善於處理事情，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並使我們經營和管理的事業能够迅速地趕過別人與競爭過別人呢？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對於蘇聯共產黨工作所作的結論，現在同樣地變成我們今天在中國解放區從事建設工作的結論。列寧說：「現在，全部關鍵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羣衆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習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這結論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陝甘寧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所作的演講的最後兩句話：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 陳伯達

(一)

各解放區製造工具的工業和製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之增加與供不應求，鼓舞了農民解放後中國新工業迅速發展的無限前途，而工業生產力的偉大標誌，更特別表現在工人對於生產的新的積極性。

在解放了的地方之一方面，是工人的勞動態度發生了從所未有的變化。工人們的口號，叫做「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建立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解放區工人階級新的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下推動生產力前進的最主要的動力。有一個城市的鐵路工人代表會，已把建立新的勞動態度列為工會的工作綱領之一。根據一些公營工廠的資料，工人們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採取「磨洋工」的態度，去對付日寇和國民黨的壓迫，有時一次大小便，也可以拖它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吃飯慢吞吞；但現在工人們說：「可不能再磨洋工了」，現在是給人民自己幹活了。過去上工的笛聲響了之後，工人們還要這樣那樣拖點上工的時間，現在一聽到笛聲，就趕着上工了。過去爲了生活而偷盜材料，或在工作中缺乏責任心而浪費材料，乃是通常的現象，現在工人們對這樣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如有個別偷盜的，工人們就自動去追回來。所有這些，乃是目前解放區工業生產力發展最積極

的因素。一個剛解放不久的城市，那裏鐵路工人修路的情況，可說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典型。原來一根鐵軌要八個人抬，隨後就減為六個人，再後又減為四個人了。過去攆木板是一個人每次攆兩塊，現在有的竟攆到二十二塊，平均是八塊。過去抬枕木，平均兩個人一根，現在平均一個人一根，最高紀錄是一個人三根。過去修路，兩百人一天修六百米，現在平均一天修一千五百米，最高達到三千零五十米，超過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紀錄。鐵路附設的鐵工廠，同樣是這種情況：過去某種鐵路器材，一天一班十二三人出五六十塊，現在最高可達到一百五十塊，平均可保持一百三四十塊；螺絲過去一個架出四五十條，現在可出七八十條。有一個紗廠，過去工作十二小時，生產一磅紗，現在工作八小時，也同樣生產一磅紗。有一個鐵工廠，現在十小時的工作，比過去十二小時的工作還強。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是工人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的表現。用一切方法鞏固並繼續提高工人們的這種政治覺悟，將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最可靠的保障。不僅是這類公營工廠是這樣；在私人資本的企業中，勞資關係處理的正確，那裏工人們的勞動態度，也同樣起了新的變化，經常有提高生產效率的新鮮事實出現。

另一方面，自由資產階級則驚慌農民解放後市場的廣闊，他們怕的是賣不出來，不怕買賣不出去，因而對於工業經營激起了極大的興趣和熱忱。許多鐵工廠的資本家，都在計劃如何擴大自己的生產事業，只因爲材料不夠供給生產工具的生產而着急。一個解放不久的城市，私人棉織業即由二十多家發展到一百多家，而過去在蔣介石匪幫統治下，却由日寇佔領時代的五十家減到二十多家。自由資產階級在解放區找到了發展工業的真正出路。

目前解放區繼土地改革而已經開端的工業高潮，以及工業生產效率在各種程度上的提高，這是工

業生產力向上第一步的變化，這種工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正如土地改革後農業生產力向上的變化一樣，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及其必然勝利，而封建買辦與官僚資本的經濟制度，則極端腐朽及其必然死亡。

(一)

中國共產黨的工業政策，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共產黨經濟政策的一切方面，是以保護生產和發展生產出發。離開發展生產這一個出發點的政策，將是錯誤的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堅定地保護工商業；在職工運動中，共產黨解除殘留在工人身上的封建性的壓迫和束縛以後，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並努力對於工業發展的貸款和貨物流通等等給了便利的條件，為着使得工業能夠不斷獲得原料而擴大生產，對於煤鐵及其他礦物的擴大採掘，也已成爲我們黨和民主政府需要重視的任務。

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和消滅官僚資本而爲中國工業發展建立最廣大的前提，並對民族工業實行堅定的保護政策之後，對於發展工業的政策有根本意義的，概括說來，是兩個政策：一個是勞動政策，另一個是稅收政策。

第一，是關於勞動政策。這個政策主要的問題，是工資問題與工會問題。

在工資問題上，過去某些老解放區有過這樣錯誤的情況，即脫離那裏的一般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因而提出過高的勞動條件，過份地提高工資，使得工人們過着特別優裕的

生活，同時也就使得該項工廠因為生產成本太貴，生產品不容易賣出，而該項工廠要擴大生產當然也就成爲不可能，有的工廠甚至因此不能以廢養廠，而在有些公營工廠（指普通工業的公營工廠）中竟至需要政府的很多財政補充，才可能使該工廠繼續開工下去。若干擁護這種辦法的同志，覺得這樣就是「保護工人利益」。這種想法或這種辦法之所以錯誤，就是因爲其結果不但不能夠發展工業，並且不可免地使初生的或幼稚的工業陷於萎縮，或使工廠得到關門的結果。這是工人運動中一種自殺的政策。同時，這種勉強人爲的，無原則的，即不合理的過份提高工資的方法，也不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不能夠鼓勵他們對生產與節約的努力；並且會使得有些工人們起了一種錯誤的想法，使他們走上庸俗的經濟主義的道路，使他們覺得可以有生活的特權，而這也就會使得工人們與其他的社會勞動人們，特別是與農民們之間，發生生活上的互相歧視與磨擦。所以，這樣並不就是保護工人利益，相反，這是在根本上違反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所以這種政策我們不能採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反對上述的錯誤偏向之後，也可能發生出或已發生出另一種偏向，即忽視工資問題的正確處理能夠大踏步的推進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不問生產效率是否增進，却一律把工資限定在最初的低的水準上，對於特別努力提高生產和減低成本工人和職員，沒有適當的獎勵，對於怠工和浪費材料或貪污舞弊的工人和職員，沒有適當的處分等等。很明白：這種政策，也將損壞工人和職員們的生產積極性。還有很錯誤的，即主張技術人員與普通工人的人所謂「生活平等」，而對於技術人員和職員的薪水降得過低，這當然也會損壞技術人員的生產積極性，並同樣地會反轉而影響到損壞工人們追求進步的生產積極性。當然，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是中國革命領導者的階級，他們是能夠接受正確的政治動員，而加緊自己的生產積極性的，很多新解放了的地方，那裏工人

們——特別是公營工廠的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首先是受到政治解放的鼓舞而提高起來的。但是，這種積極性，如果沒有經常合理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來加以鞏固，只專靠政治的鼓舞，是不能繼續提高，甚至不能經常保持的。因此，必須有正確的經常能刺激工人職員生產積極性的工資政策。正確的工資政策，應該是根據當地當時的一般生活條件，以解放前的舊工資為基礎，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整，並在這個基礎上，實行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減低生產成本）……等類的合理的與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以及按勞動分紅等類的累進獎勵制度。工資制度，須根據各種工業部門的具體情況，各個工廠的具體條件，由廠長負責，與工廠管理委員會及工資評定委員會商量，與工人代表及工人羣眾商量，吸收本廠的與別廠的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決定或採用這樣辦法，或採用那樣辦法，或對於兩樣幾樣的辦法都交錯地靈活變通採用，並由廠方與工人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條件或獎勵辦法的具體協定，而工作的考核則都要把生產的數量與質量並重。在各工廠之間的工時與工資，應互相協議，一律達到合理的規定，但應根據各廠的具體情況，容許若干差別，不可能完全一律平等。總之，一切以對於經常能提高生產有利作為決定的先決條件。對於技師和職員的薪水，同樣需要採用這類似的制度，在保持實際的舊薪水的基礎上，根據他們工作的新勞績，節約（減低生產成本），或新創造，而按等累進。毫無疑問，根據新舊的經驗，建立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極大地鼓舞工人們與職員們的生產熱忱，嚴肅職工的勞動紀律，改善工廠的勞動組織，提高生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杜絕浪費，監視偷盜與貪污舞弊，減少各種不生產的消耗，並不斷提高工人們與職員們的技能，使技術落後的趕上先進的，而先進的又求更新的進步。這是推動生產力前進極重要的制度。這是鞏固和發揮工人們與職員們新的勞動態度的物質基礎。實行這種制度，使工廠的生產效率可能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

以至比這更高。這樣，工廠的工資支出雖然比前增加，可是生產收入的增加却比工資的增加要大的很多，以至前途是難於計量。有些同志不善於作這種發展生產的企業計算，受陳舊的八股式工作所束縛，看不見生產力發展的前途，害怕在公營工廠中建立這樣的制度。這是完全錯誤的。有的同志覺得實行這種制度會鼓勵工人們的「僱傭觀念」這也是很錯誤的。不要忘記：我們現在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這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是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工人們的僱傭觀念是不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的空想。在按件工資等類制度下，工人們因為進行更多的生產而得到更多的報酬——或者說是因為求得更多的報酬而進行更多的生產——的「僱傭觀念」，並沒有害處，而且是合理的，進步的。工人們取得更多的報酬，是由於出了更多的勞力與能力，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前進，另一方面，可能以更多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即比較廉價的工業品供給農民，這樣，也就能够被農民和一切的社會勞動份子認為合理，或也就可以更加強工人和農民及一切社會勞動分子之間的團結。誠然，實行這種工資制度，是有困難的，因為這種制度需要精確的監督檢查與計算。但是，這種困難，是容易經過羣衆的評定來克服的。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必須建立在可能的與羣衆自願的基礎上。這種工資制度或獎勵制度，將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利益，也代表工人羣衆的個人和全體的利益，所以，就容易激起並得經常保持工人羣衆生產與節約的競賽的自覺熱潮，並容易由羣衆自己來建立一種羣衆互相監督，互相檢查，互相評定的制度，使那些積極工作，善於節約，愛護公物的工人、技師和職員，獲得應有的獎勵，而使那些怠工、浪費物資、偷盜貪污的人受到應有的處罰。

這種刺激生產的工資制度與獎勵制度，在私人資本的工廠中，已有很多採取的，積了不少的經

驗，在經營上獲得了很多利益，今後同樣地應該獎勵（但不得強迫）他們合理的自由採用，而公營工廠應當向他們學習已經有了的這種許多不同的合理的很有用的經驗。

關於勞動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問題，即工會問題，在解放區也提出了完全新的問題。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和工會工作，應該在上述工人們建立新的勞動態度的正確口號下，鼓勵工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公私工廠的工人與廠方（公營工廠是廠長、經理及工廠管理委員會，私營工廠是私人資本家及經理等）共同商量締結生產計劃與工資的協定，並經常集中生產的經驗教育工人，把我們的工會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生產的學校。同時，在各工廠創辦為工人謀福利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應當具有消費與生產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供給工人消費品，使工人們的工資不受或少受市場上物價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幫助工人解決家庭生計的困難，使工人得以安心工作。現在由於物價經常波動，使規定工人工資發生困難，有些工廠按每月米、煤、布等實物價格來規定工資，不過這是非常複雜的，工人也要受些損失，工人合作社如能負擔供給工人必需品的任務，在一定時期內不變動各種物價，即在一定數量上配給工人各種必需的實物，則可使工資在一定時期內不致變動。工人也不受損失。比較固定價格的實物配給制，是戰時比較最能保護工人利益的。這須要政府、工會與合作社的一致努力，才能很好的實行，工會與合作社就應用大力來辦到這一點。應該說，我們許多在工會工作中的同志，對於這些事情，是還不熟悉的。但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三）

第二、關於稅收政策。

我們黨的綱領是保護工商業，但工業比起商業來，工業又是最基本的。工業生產社會的財富，而商業（指正當的商業）只是盡商品流通的職能，是在一定社會中發展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經濟活動，故必須保護商業，使其能夠順利的盡其一定社會的合理的職能。但商業並不生產社會的財富。曾在某一個座談會上，有些工業資本家提出工業與商業的稅收，應該有些區別，工業稅比商業稅更需要從輕，以便促進生產的發展。顯然，這種要求是合理的，應該成為解放區稅收政策的原則之一。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一個原則。同時，在那個座談會上，又共同同意：在工業各部門之中，對於製造生產工具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稅比製造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工業稅，又需要從輕，顯然，這種意見也是合理的。這是工商業稅的第二個原則。工商業稅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單一稅去代替國民黨暴政時代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這些工業稅的原則，乃是從保護工業的生產出發，從保護工業發展的正確方向出發，並保障那一些製造生產工具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業有不斷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把這些原則變成實際，會有不少複雜的問題，而我們過去對這類的經驗又很缺乏，但實際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也仍然是在善於學習。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在解放初期或目前的條件下，實行起來，當然還有些困難，各地方斟酌具體情況，是可以採取一些過渡的辦法的。例如，在上邊的那個座談會上，我們同志曾經和那些工業資本家商量出工商稅一種過渡的辦法：即由政府稅收機關根據當地各種行業的廠數、資本、營業等等具體情況，擬出一定期間（比如半年或一年）的該業稅收數字，並和該業資本家商議此項數目是否適當，即由該業資本家共同負擔下來，然後在該行業內，由各廠民主討論，自報公議，按能力公平分配負擔，先營業後納稅，而在這個負擔的期間內，除交納這個數目外，不問該工廠的生產如何擴大，不再加稅。參加座談會的工業資本家，一致歡迎這種過渡的辦法，他們覺得這種辦法好辦，而更

重要的，是這種過渡辦法還可促進各工廠擴大生產或改善生產技術的自由競爭，交納多少又是經過大家公議，同業之間彼此都很熟悉，很難自作弊，可說是公私兩利。在還不能順利實行正常的工商業所得稅之前，各地實行類似這種對於發展生產有利無害的過渡的稅收辦法，是很有必要的，而在試行的初期，因為經驗還缺乏，同時，是對於投資和經營的新鼓勵，稅收的數目是應該以定得比較低些為適宜。

(四)

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將解放更多更大的城市，以及土地改革後工商業的發展，處理工商業的具體政策問題，已成爲我們黨日常須要注意的議事日程。經常集中經驗與羣衆意見，定出方法，修正錯誤，這是能够保證我們正確地執行毛澤東同志的理論與政策。

掌握布爾塞維克領導經濟的方法

白俄羅斯共產黨
(布)中央書記

古薩洛夫

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大大的提高了恢復和發展工業與農業的速度。

共和國的工業完成了一九四七年工業品總產量的百分之一百零二。許多新的大企業亦業已開工。各城市在一年中恢復和建築了二十三萬二千平方米面積的住宅。

爲了執行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共和國的集體農莊莊員及農民田莊在一九四七年擴大了春季播種穀物百分之十八點二，和冬季穀物播種(將於今年收割者)百分之二十二點一。拖拉機供給站超過了拖拉機工作的計劃。共和國提前完成了國家的徵糧計劃，給國家超出計劃多交了一百五十萬普特以上的穀物。同樣提前完成了土豆的徵收計劃和動物油的出產量。在鄉村裏在一年中建築起了六萬八千九百四十八所住宅，佔預定計劃的將近百分之一百一十。

共和國的組織領導了廣大羣衆爲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而鬥爭的社會主義競賽。達到了黨的組織工作及政治工作的某些改善。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增長起來了。黨的機關改善了其對共產黨員的馬列主義教育及幹部工作的領導。在學校中，講習小組中，黨的教育系統中，甚至有大部份共產黨員也自動的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設立並開辦了一個二年制的共和國黨校，十一個馬列主義夜校，二百一十一

個區的夜習黨校，二千五百個政治學校和其他的等等。居民中羣衆政治工作的水準大大地提高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着嚴重的破綻和缺點的。生活給我們提出了新的巨大的任務，要求進一步改善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要求鑽研領導工業和農業的方法。

白俄羅斯許多黨的組織還沒有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徹底地改造自己的工作。在我們實際工作中經常有這樣的事實，就是把一些不屬於自身的經濟組織和經濟機關的職權包攬在自己身上。這樣就勢必包辦代替國家的和經濟的機關，並把黨的機關變成無所不管的處理經濟工作問題的行政管理機關。教育黨的組織怎樣正確的結合黨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我們還作的很少而且作的不好。

我們應該以斯大林同志關於在工作中在實際情況中不能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的指示作為經常的指導原則，因為在生活中政治和經濟經常是共同存在並一塊活動的。斯大林同志說：「誰要想在我們實際工作中把政治同經濟分開，想以減少經濟工作的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或者相反以減少政治工作的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誰就勢必要碰釘子。」布爾塞維克主義是唾棄那種迴避經濟工作，迴避經濟任務和忘却黨的政治工作的現象的；共產黨員是和狹隘的事務主義者沒有因緣的。

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中有許多平行主義者，他們經常混淆自己的職責。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共和國部長會議過多的發佈了共同的決議，這些決議經常是實際上並沒有必要的。其中有些決議直接推動地方黨的機關去包辦代替蘇維埃的經濟機關的工作。

我們給地方黨的機關主要的是在經濟問題上發出了數量繁多的決議、調令和指示。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成份在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部門中及其領導工作者中間還沒有根絕。

這些缺點在不久前召開的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全會上曾被以布爾塞維克的直言不

諱的精神及不可調和性加以揭露。全會的參加者正確的批評了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還沒有把黨的組織及黨的政治工作問題作為自己工作的中心。

我們現在主要的任務在於鞏固地方黨的組織，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使他們能夠對當地國家機關及經濟機關的活動實行黨的監督，批評並剷除在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執行自己在羣衆中的政治及組織作用。

在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及白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工作中發現的缺點，並非少數而是在很大範圍內屬於一些省的區的黨委會及勞動代表的省、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非常遺憾的，在我們這裏，有一些黨的省委會在進行一個經濟及政治運動時，完全不利用黨的及非黨的積極分子的廣大集團去參加這些運動，也不依靠黨的基層組織。

一些省委經常在解決一些經濟問題時包辦代替省執行委員會（指政權機關——編者）的工作。譬如：波勞茨基及格勞德涅斯基的省委實際上取消了省執行委員會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他們忽視了黨的政治工作，而把自己變成一個行政管理機關了。這一點對我們的事業帶來了浩大的損失。黨的機關把一些日常瑣碎的經濟工作包攬在自己身上，而本身却沒有為進行此一工作所必須的機構和專門人材，沒有進行該行工作的足夠知識，而同時，擁有龐大機構及部門的省執行委員會却工作得毫無生氣。

就拿徵收木材作例子吧。我們共和國在完成國家這一極其重要的任務時是落後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一些黨的組織沒有很好的領導木材徵收工作。省委把一些徵收木材有關的工作：如組織勞動力，物質技術保障，集中及運轉的任務分配，對運輸工具的關心，及所有應該由蘇維埃的及經濟的機關作的日常瑣碎事物的解決，都獨攬在自己的肩上。如像實現對這一極其重要的運動的政治領導，對

經濟人員活動的組織監督，對黨組織的工作審查等應該是省黨委及區黨委執行的工作，他們却把它置諸腦後了。

從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現在我們的頭等任務在於最終地根絕這種包辦代替蘇維埃的及經濟機關的有害的作法，並集中注意力於發展經濟的主要問題，和開展黨的政治工作。

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說：布爾塞維克式的領導經濟機關的方法在於「有系統地鞏固這些機關，並不是超越其上，而是經過它們去領導生產」。假如蘇維埃的或者經濟的機關担当不起提交給他們的任務時，倒應該不是去包辦代替它，也不是去解除他們的職責，亂插一脚，而是鞏固它，派幹部去幫助它。黨的組織也可以此提高地方蘇維埃——作爲一個國家政權機關——的經濟組織者的及文化教育者的作用。

最近以來，白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實現了一些鞏固區黨委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尙遠感不足。我們很少教育區黨委以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作風。很多的區黨委沒有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少共團組織。沒有依靠廣大的集體農莊的和蘇維埃的積極分子。這樣的區黨委對集體農莊的生活很不熟悉。經過所謂「代表路線」的這種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領導機構使區黨委和黨的基層組織隔絕了。這些區黨委的領導者，時時刻刻以行政管理來代替組織工作，他們是以經濟工作人員的方法辦事，而不是以政治工作者的作法辦事。

鮑普魯斯基省的斯魯茨基區可稱爲不壞的一個區。就在這裏也很明顯的表現出了黨領導的缺點。區黨委主要的解決目前帶運動性的問題時，解決得很浮皮表面。區黨委陷入了這些運動的事務中却不去處理真正的黨的政治問題，他的領導者看不到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認真研究集體農莊的經

濟，對本區居民的文化生活問題毫無興趣。在區黨委的工作中，沒有明確性，沒有計劃性，和區執行委員會的職權混淆不清。

不久前區執行委員會討論了在該區預防火災的實行辦法。過了幾天後，同一個問題又提到區委會來討論。二月二十七日，區委會聽取了拖拉機供給站經理巴烏馬斯基關於同集體農莊簽訂合同及修理拖拉機的報告。次日，同一問題又提到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去討論。此類情形也經常發生在鄉蘇維埃主席中間：今天在區委會上作了報告，明天又到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報告，而講來講去，還是講的那一個問題。斯魯茨基區黨委的缺點也一般的象徵着其他很多地區的情形。許多的區黨委忽略了共產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忽視了鞏固黨的組織及用一切方法擴大勞動人民中羣衆政治工作的任務。這些區黨委把全部領導黨的基層組織歸併到領導日常經濟運動中去了。

不久前在我們這裏召集了區、市黨的總結選舉代表會議。這些會議揭露了很多黨委會工作中的缺點。代表們指出了應以治本的方法來改善黨的政治工作之必要。他們批評了那種有時是不必要的亂派代表到下邊去的不正確的作風制度。代表們指出了在黨組織的領導中存在着有害的文牘主義及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

我們應該堅決的消滅所有這些缺點。黨的組織應該是培養勞動羣衆共產主義精神及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的政治的組織者和教育者。問題是在於要使黨的機關領導者的注意力轉向在羣衆中去做工作。我們要以加強所有黨的工作的辦法達到此點，並提高黨組織的思想生活水準。

在白俄羅斯勞動人民面前，在一九四八年——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有決定意義的一年，擺着很重要的任務。

我們的工業同去年比較，應該擴大生產百分之四十九。本年度將要投入將近一百萬盧布的資本，事實上大大的超過一九四七年所投入的數目。應該達到不僅僅要使工業企業生產不要虧本，而且應該生產出新的利潤，一天天的發掘新的生產資源，改造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和機械化，找到新的改善勞動組織和銳猛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道路，以便日復一日的提高產品的質量。實現最嚴格的經濟制度應該成爲保障經常有系統地減低產品成本的各企業的工作法律。應該加強注意於居民物質、文化要求的充分的滿足，更多的關心人民的需要和勞動人民的物質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設備。

我們在一九四八年，應該更堅決的爲更進一步實現聯共黨中央二月全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斯大林的戰後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的計劃。今年春天將要在集體農莊中擴大播種面積達百分之十八點三。白俄羅斯今年穀物播種已經可以達到戰後五年計劃最終一年所預定的水準了。同樣的計劃着擴大土豆、亞麻、和膠樹的播種面積。我們在農業中主要的任務就是用一切方法爲穀物及技術作物的提高而鬥爭，爲社會公有畜牧的繁殖而鬥爭，爲集體農莊組織的及經濟的鞏固而鬥爭。

爲了光榮的担負起這些任務，黨的組織應該完全掌握要求結合黨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作風。黨機關的領導方法應該每時每刻發揮共產黨員及廣大勞動羣衆的自動性與積極性，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自覺性，以便他們能够提高我們幹部對剷除工作中缺點的責任感，以便保障加速今後走向共產主義道路的速度。

（蘇英譯自四八年四月一日真理報）

黨的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成功的

基礎

達吉斯坦共產黨
(布)中央書記

卡弗羅夫

近幾年來達吉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大大地發展起來，出現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農作技術提高了。共和國的勞動人民順利地完成了戰後五年計劃頭兩年和一九四八年前三個月的任務。

在四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全民競賽的情況下，要求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更進一步的加強，要求黨的領導水準更進一步的提高。

不久以前達吉斯坦黨的機關進行的總結和選舉，明顯地表現出，對黨的領導者們產生了如何的要求。

在基羅瓦巴特區黨代表會議上，區委第一書記麥堅切夫同志的工作受到了嚴正的批評。區委書記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不依靠基層黨的組織和黨的積極分子，忘掉了在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他覺得自己是行政上的唯一首長，他以老早就已經陳舊了的並爲黨所唾棄了的方法去領導。不去實行政治領導，區委書記把一切生活瑣碎問題的解決攔在自己身上。

結果基羅瓦巴特在共和國內成爲最落後的一個區。新的區委和區委書記被選舉出來後，共產黨員

們要求他們堅決地轉變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以黨的工作配合經濟工作任務的完成。

應當指出，麥堅切夫類型的黨的工作人員，在我們這兒只是特殊的情形。各地方黨組織的絕大多數領導者都是能正確地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實現黨的路綫，善於組織羣衆，克服各種困難的人。

屬於這一種黨的領導者的人們，例如奧爾東尼基節阿巴特區的區委書記，現在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阿布拉林同志，他不久以前曾在「真理報」上詳細地敘述了關於黨的工作的經驗。

得扎爾金·扎節同志做了二年的區委第一書記。列寧納巴特區的經濟是異常多種多樣的。棉花是主要的農作物。該區有許多卓越超羣的植棉名手，這些人中如布拉特·包包加林諾夫，米露瑪爾·尤奴索夫和其他等人。他們都配稱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高尙稱號。在集體農莊中有大的牧畜羣，高度發展的菓木園藝和蠶桑業。在區的地區內分佈着重要的工業企業。

由於正確的領導，該區許多部門的經濟順利地發展起來了。去年長纖維棉每海克脫（一海克脫等於中國十六畝）平均收成爲二千五百四十公斤。公共牧畜業的發展和農業大大地超過了任務。所有的工業企業都超過了全年計劃。列寧納巴特的區委和其第一書記得扎爾金·扎節在這裏是有很大的功績的。

得扎爾金·扎節同志善於把大量的積極分子團結在區委周圍。他了解一切植棉名手，植棉名手也了解他。區委的力量就在於同羣衆的牢固的聯繫。因爲春寒，列寧納巴特區在去年陷於嚴重的情況中了，這裏大片的土地必須重新播種。由於共產黨員爲提高收穫量而鬭爭之巨大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一切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情緒都提高了。以黨的組織和一切集體農莊莊員們的努力，獲得了棉花高度的收穫量。

在去年共和國的許多其他地區同列寧納巴特區一起獲得了很好的成績。四個區委書記榮獲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在所有黨的代表會議上，特別注意了區委、市委和省委的領導工作方法的改善，黨的工作經驗的總結。共和國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作方法，就是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不久以前進行的全會所研究的課題。必須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指出，我們共和國黨的領導工作人員們，至今尚未充分明顯看出：以黨的機關包辦代替蘇維埃的經濟部門的工作，在對經濟的政治指導方面，表現了極大的消極作用。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作了許多日常經濟問題的決議，而這些問題共和國部長委員會是完全可以單獨解決的。我們常常實地執行了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和共和國部長委員會共同的決議。我們經常不注意中央某些領導者祇是沾沾自喜於一切經濟工作的瑣碎事情。

最近達吉斯坦中央開始糾正了這些缺點。現在，對一些日常經濟問題的決議照例是由共和國部長會議去作。中央局給各地方黨的機關發出指示，監督這些決議的執行，圍繞這些決議的執行展開廣泛的黨的政治工作。

這種領導方法給予黨的機關可能更深入地研究蘇維埃機關和經濟部門的工作，更加有效地監督和指導他們的工作，研究各種重大問題，從政治上去評價各種現象。當省委、市委和區委停止了他們包辦代替經濟機關，取消了對這些機關多餘的瑣碎的監督之後，在各省和各區裏就產生了更多的積極分子，幫助各級黨的機關履行各種預定的措施。

成百成千的各種專業的工作人員都對委託給他們的一定的事情負責。如果一切部門，一切工作人員，一切專門家都友誼地，確切地和協調地工作，如果一切共產黨員都積極地參加政治工作並以實際

行動履行其先鋒作用，十分自然，省的區的工作是會進行得順利的。

黨的組織所實行的各種措施，祇有吸收廣泛的（而不是狹隘的）積極分子參加，才能獲得成績。如果黨的積極分子，一切農莊和集體農莊的積極分子，各省的，區的蘇維埃政府和經濟機關的領導者都能以身作則地實地參加為高產量的鬥爭，那麼就可以有保證地說，這種收穫量是能夠獲得的。

省委，市委和區委書記，如果他包辦代替了蘇維埃和經濟機關的工作，取消了成十成百熟悉自己事業的專家的積極活動——這種領導者所注意的，就像一個指揮手不去指導管絃樂團的工作，而去作所有音樂家們所能作的事情一樣，那麼，其結果就會相反。

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不是減少黨的組織對經濟工作情況的責任心，而且恰恰相反，要經常加強這種責任心，並且要求各級黨的機關要有更加深入了解情況，更有效的領導，對剷除缺點要有很大的機動性。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要求黨的領導者有鞏固的理論素養，廣闊的視界，實際的經驗和與人們一起工作的技巧，並能把成百成千的積極分子團結在黨的機關的周圍。

這不是一切人都能辦到的。我們還有這樣一些黨的領導者，這些人繼續老一套去工作，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方法比一切方法好或者習慣於這種工作作風，而是因為根據新式方法去工作更加困難的多，而且對於按新的方法去工作，必須要掌握確實的材料。政治領導者必須不僅是優秀的實際家，而且是政治家。他必須擁有高度的政治和一般文化素養，俾能成爲有能力解決領導經濟和黨的政治工作之複雜問題的人員。

黨要求黨的工作人員是能創造的工作人員，他要善於分析各個地區事情的狀況，善於集中注意力於各種主要問題上，據有預見的才能。所有黨的領導的這些品質，現在都具有巨大的意義，它們，這

些品質，我們必須以此來培養我們的幹部。

不久以前我們同庫爾干，秋濱區委書記巴拉莫諾夫同志進行了談話。巴拉莫諾夫同志這樣懇切地把區委的任務同今春的新情況聯繫起來談到：

——今年春季不像往春。如果在一九四七年我區是在四月十一日植棉，而於五月初在大部份土地上已開展其次的耕種，那麼今春要遲二十至二十五天。新的情況要求區委，以及基層黨的組織以新的一套去佈置工作。

的確，庫爾干，秋濱區委表現出了在今年組織農村經濟工作的偉大的遠見和實際效果。春運要求在盡可能縮短的期間完成播種的一切工具。棉花的晚種同樣要求更多的進行耕作，並要求其兩次之間距離時間的最大限度的縮短，而質量則要大大的提高。區委，基層黨的組織及時地作出了行動的戰鬥計劃並順利地實現了這一計劃。

現在區委和基層黨的組織發動了集體農莊間的，各突擊隊間的，各組間的及農莊莊員間的競賽，製定了社會主義職責之執行的互相檢查計劃。這種檢查的第一步已在播種期間實現了。區委和基層黨的組織此時展開了巨大的政治和組織工作，以剷除由互相檢查而揭發出來的缺點。

在今年我們已不再派遣經常性的全權代表赴各區工作。經驗證明許多時候他們約束着地方領導者的主動性，降低了他們的作用和威望。

爲了指導，爲了予以幫助，我們定期地把共和國的和省的一些領導工作人員派到各區，這些人周密地了解各地情況，可以告訴他們應當如何採取辦法克服缺點。但是現在各地方的領導者自己要實現

達吉斯坦共產黨（布）中央和省委的工作人員共同製定的措施了。我們也可以給下層工作人員以幹部政治學習和一般文化學習，經驗的傳達，舉辦各種重要問題的專門臨時訓練班及各種會議之組織路線的幫助。

達吉斯坦是我國巨大的產棉區。一九四七年共和國之子棉的總採集量在蘇聯佔第二位，而產量則佔第一位。向國家繳納棉花的計劃是大大地超過了。在進入新的農業年度之際，達吉斯坦植棉者們預約在一九四八年要大大地超過在五年計劃之最後規定的棉花產量和總採集量的任務。為爭取這些任務的實現而鬥爭，是達吉斯坦黨的組織之主要的任務。

在我們共和國穀物的生產是落後的。現在黨的組織正在研究這一問題，以便提高這一經濟部門，而且在今年穀物的產量將要大大的提高。

牧畜，蠶絲，菓木在共和國的經濟中佔着很大的比重。我們給自己規定的當前的任務，也要在這些農業經濟部門中大大地超過一九四八年的任務。

達吉斯坦工業的工作人員們預約在五年計劃中之第三年生產計劃於十一月一日前完成。前三個月的總結說明了許多的企業和工業部門都順利地完成着自己所受領的任務。

我們知道，要解決戰後五年計劃中有決定意義的第三年所規定的任務是與黨的組織工作和黨的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密切聯繫的，是直接地依靠幹部教育工作的加強，依靠分別的對待每省，每區，每個集體農莊，每門企業的態度而決定的。

我們要求共和國黨的工作人員在解決一切大小問題中，要具有高度的原則性。他們必須經常以政治領導者所必須的一切品質去教育自己。黨的領導者必須成爲一切共產黨員，一切勞動人民的榜樣。

歷史上再找不到像我們布爾塞維克黨這樣有威望的黨。在我國所經歷的偉大考驗中，黨多次地證明了她是保衛人民的利益，是同人民相親相近，是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緊密地聯繫着的。成爲這樣黨的黨員，其光榮和職責是偉大的。

（付克譯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真理報）

政治工作是鞏固經濟成績的條件

聯共黨莫斯科
黨委書記

斯·鏡爾寧作

改善黨的政治工作問題，已成爲目前正在進行着的黨代表會議注意的中心，這並不是偶然的。無論過去或現在，黨一貫是要求黨的領導工作者，要善於領導經濟工作，警告他們不要單方面的去注意生產問題，或黨的政治工作問題。黨迫切地要求他們善於把經濟工作政治工作結合起來。

戰前，在指導經濟的問題上，黨的組織會積累了許多經驗，使它能夠解決許多發展經濟的最複雜的問題。黨的組織已經學會領導經濟幹部與廣大勞動羣衆去解決各種重大問題，它已開始精密地研究技術、技術科學、經濟、財政等問題。這在戰時表現尤爲明顯，當時黨不得不經常作些管理經濟的事務工作。

但在戰爭結束以後，工作的環境與條件都已改變了。因此也要求黨改變其領導經濟的方法，改造其工作。這一改造的意義，在於使黨從分外的管理經濟的事務工作中解放出來，而成爲真正的政治領導機關，使之對政府機關與經濟機關的工作能夠進行真正的監督。

對行政、經濟工作具有監督權，這絕不是說黨應該分担經濟工作者的部份職務，去解決經濟上的事務問題。但是某些黨的機關由於未能正確地執行其對行政工作的監督權，正干涉着經濟工作領導者

們的具體工作，代替他們的工作。這就降低了經濟工作者對工作的責任心，使他們常常想躲藏在黨組織的背後，結果就會產生一種不負責任的心理。某些黨的工作者忙於代替經濟工作者做工作，結果，無可避免地會放鬆黨的政治工作。

拿聯共黨（布）薩高爾斯基市委的實際工作情形為例來看一看吧。他們在局務會議上討論工業問題時所作的決議，有時竟與經濟領導機關的指示一模一樣。比如在討論某工廠建設進程時，該市委作出了這樣的決議：「責成工廠經理與總工程師採取堅決步驟，以保證建設所必需的一切物資，在供給部門內組織建設事宜服務小組……為組織工廠基本建設部，須將各生產間的建築工人調至這一部門。每日以百分比形式向市委報告一次。」

聯共黨（布）耶戈爾城市委在討論「無產階級領袖」工廠的工作時，給工廠經理與總工程師寫了二十三點意見，都是關於經濟工作具體步驟的，這些意見，就其性質來說，可以毫無更改地用作工廠經理下達命令的根據。但對於黨的工作問題，市委會却只作了兩點一般的指示。在給黨委書記與工廠委員會主席的指示中是這樣寫的：（一）要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提前完成任務……（二）要改進對羣衆的特別是對新參加之青年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

這些以及類似這些例子，證明了黨的領導者還未擺脫其不正確的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由於某些黨的機關完全鑽進到事務性的經濟工作裏（而這些工作本來是應由經濟工作者去作的），因此就很少去考慮工作的前景，未被利用的後備力量等各種可能利用的條件問題。同時他們也就放鬆了黨的政治工作，而把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樞紐——羣衆工作——忽視了。

領導的鬆弛，並不是對經濟工作者實行瑣碎的監督。政治的領導，就是要善於把政治與經濟，把

政治工作與解決重大的經濟任務結合起來。黨的組織於其對經濟工作者的工作實行監督之同時，必須以其組織工作動員集體的力量為改進各該企業的工作，為達到新的成績而鬥爭。它要參與討論完成某些基本生產技術任務的進程，檢查領導生產的黨員經濟工作者的工作，動員人民參加高度生產的工作，組織羣衆性的大競賽，並由此給予生產事業以影響。

經驗證明，黨是可以經過對經濟工作實行政治監督，以加強其對於經濟事業的影響的。所謂黨的監督，實際上乃是社會監督。凡是黨的組織生活活躍，與人民有密切聯繫，並有很好的黨的政治工作的地方，這一監督工作就可進行得好。黨對於政治工作是負有完全責任的。在保衛祖國戰爭時期，對勞動人民的政治工作會幫助蘇聯人民認識了自己對人民、對祖國的職責，培育了勞動人民熱烈的愛國主義，號召蘇聯人民獻身於勞動。現在當各種和平經濟建設問題被提到第一位，當黨可以從對於經濟工作者的瑣碎監督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對羣衆政治工作的水平，就必須更提高一步。誰要是了解這點，誰要是對羣衆政治工作估計不足，誰就不僅要犯實際工作的錯誤，而且要犯嚴重的政治錯誤。

正確的經濟領導，要求黨的工作者不斷地擴大自己的政治眼界，提高自己辦事能力。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他們才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

莫斯科州的工業提前完成了一年的生產計劃。但有某些企業却没有完成任務。有部份企業並未能保證按照規定的項目完成其計劃。其未完成計劃的原因，是某些黨的領導者忘記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不懂得工業，不研究工人的生活狀況，不注意工人的要求與需要……就不能領導城市工作。」

我黨在政治、文化、經濟方面豐富的多方面的經驗教導我們，羣衆的社會政治自覺可以大大地有助於我們最順利地、實際地解決任何巨大任務。羣衆的自覺性愈高，便愈能迅速、精確的實現黨的口

號與指示，使黨能獲得更大的建設成績。因此，黨的任務，乃是在羣衆中，進行高度思想水平的，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教育他們，經常深入地向他們解釋我們成績的意義，當前工作的範圍，說明全蘇聯人民——愛國者——的神聖職責與義務，就是勤勉地工作，不疲倦地鞏固蘇聯的經濟力量。

黨的政治工作，必須保證完成我黨，政府，和我們偉大英明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提給蘇聯人民的任務。在這裏所謂必須把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意思就是說，市黨委，區黨委與基層組織，在討論這一或那一企業的工作時，必須深刻地全面地分析它落後的原因，沒有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的因素，及生產率提高得不快的原因等等。在弄清了這些情況之後，黨的組織還必須首先去了解人，了解他們的工作與思想，並從而看出當地經濟工作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把黨的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就是說要經常去研究那些尚未解決的任務，鼓勵那些生產中的革新者，具有對新事物的敏感。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去年九月，戈魯霍甫紡織公司諾瓦霍列濱廠的女工——安娜尼耶娃與其班員一起管理了超等密度的紡機，即有二千四百紡鐘而不是普通一千九百紡鐘的紡機。因此，棉紗產量愈劇提高。市黨委向該城其他企業的工人廣泛地傳播了安娜尼耶娃同志的經驗；於是在短短的期間內，許多工人便追隨着安娜尼耶娃的榜樣，按照她的工作方法開始工作了。安娜尼耶娃同志的經驗，被全國許多企業廣泛地採用着。但是這些前進紡織女工們的工作方法，在其產地——諾瓦霍列濱廠內却在很長的時間內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這是何等的怪事。該廠的領導者——黨的、職工會的、經濟的領導者對待這一創舉，都只有表相的了解，而沒有給予革新者以應有的支持，僅僅由於市委的堅持，安娜尼耶娃同志的經驗才獲得了全國的意義。

黨的組織有監督經濟工作者，批評其工作缺點的責任，除此而外，它也有責任給他們以幫助。但

這種幫助，並不是要它去作經濟工作者所作的同樣工作，是要它用各種方法開展羣衆性的組織教育工作，關心改善職工的物質生活狀況。黨的組織是能够作很多事情的，只要它能與經濟工作者一起爲着達到同一的目標而奮鬥，而且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不是就各種具體的經濟工作通過決議（這應讓經理自己去作），而是廣泛地組織競賽，並對這一競賽，給以日嘗的具體指導。

列寧曾說道：「應該組織工農實際組織工作者彼此之間的競賽，應該與公式主義及那些企圖自上而下建立之同一模型的思想作鬥爭……。」可惜在我們中間，此種思想尙未被肅清。在許多紡織工廠中製定並印刷了許多同一類型的，上面規定了一切任務的挑戰書，祇等競賽者簽字就是了。有時竟達到這樣的程度，爲了節省紙張，把張三簽過名的挑戰書再拿給李四去用，只將張三的姓名勾掉，而競賽的條件毫無變更。必須堅決制止存在於社會主義競賽中的，諸如此類的官僚主義及惡劣行爲。

現在在莫斯科與莫斯科州的大小工廠已經展開了提前完成一九四八年生產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波多爾機械廠、「紅色無產階級」工廠與沃斯克列新化學公司的競賽號碼，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響應。成百的莫斯科工廠提出一定在十一月七號完成全年的生產計劃，大大地提高生產效率，減低貨物的成本，建築起新的住宅等等。

黨的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全國性的提前完成全年計劃的鬥爭，並以其羣衆性政治的組織工作保證完成他們所繼承的任務。

要領導生產大競賽，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完成五年計劃的速度，就必須經常關心於滿足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的與生活的需求，完成住宅建築計劃，有經營良好的商店，澡塘，洗衣店，要把關心勞動者文化和生活的需要與關心生產計劃的命運，二者有機地聯繫起來。

目前在莫斯科城與莫斯科州各區正在進行黨的代表會議，討論聯共黨（布）各區委與市委的工作報告。這些會議都是在高度的政治、組織水平上進行的，有大量的共產黨員參加了工作報告的討論。對於黨委會工作的批評，將更加提高黨的戰鬥力，更加提高我黨政治、組織工作的水平。

莫斯科州工業的成績，是廣大勞動人民高度的政治與生產積極性的直接結果，是許多黨的組織積極工作的結果。而且黨的某些組織克服其領導經濟中的缺點愈快，黨政工作水平愈高，後備力量也會利用得愈多，莫斯科人對於戰後和平建設事業的貢獻也就愈大。

（伊真譯自西曆八年三月五日真理報）

蘇聯企業經理與職工會的相互關係

蘇聯的生產資料及生產工具是全國人民的財富。蘇聯工人的勞動不是爲了資木家，而是爲了全蘇聯人民的福利。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個特點，產生了蘇聯企業中經濟工作人員與職工會的特殊關係。這個關係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能有的。

在蘇聯企業中行政管理與職工會對完成生產計劃與提高工人、職員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條件上，都同樣的注意。但是對這一共同的任務，他們應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

蘇聯企業的管理是單一責任制的原則。這就是說，管理企業，完全是集中在該企業經理之手中。企業經理是由相當的上級經濟機關來任命。因此，他們需要向上級經濟機關報告自己的工作，而且只有上級經濟機關才能够調換他的工作。企業經理有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實現生產計劃必需的資金。經理的任務——保證完成計劃。

職工會盡一切的力量幫助企業經理完成計劃。職工會的代表參加經理所召開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生產計劃問題，同時提出他們的意見。職工會對工人和職員說明他們的生產任務，教育工作人員對他們的生產任務的認識態度。職工會將工人、職員引入爲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計劃的社會主義競賽中去，傳佈先進工人——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的經驗，促使工人、職員提高技術知識，在工人中間發

揮合理化的運動及發明等。

職工會及企業的經理在工作上有着密切關係，他們進行一切的生產活動。但有時候，對於個別問題，行政管理與職工會能够發生不調和的現象。職工會沒有權力取消經理的決議，也就是說，沒有權利破壞其單一管理權。但這並不是說，職工會不能貫徹自己的意見。在這種場合下，職工會在高級職工會的幫助之下，通過這個企業經理所屬那個經濟機關來實現自己的建議，如果職工會的建議適合於經濟機關所給予企業經理關於他們履行的指示的話。

有不少的事實，就是職工會的類似行動，使得在各企業中生產的威力及生產計劃大大的提高起來。除了捲入為完成生產計劃的鬥爭以外，蘇職工會檢查行政當局怎樣實行勞動法、住房建設及工人物質供給等。職工會管理着社會保險措施。

蘇聯政府在勞動保健及技術安全方面每年支出巨大的經費。職工會嚴格檢查經濟工作者如何使用這些資金。職工會參加製訂這些資金使用的計劃，採用改善勞動條件必要的辦法，與經濟工作者簽訂特別條約，其中也包括團體合同，並檢查他們每日如何來實行。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二千五百名技術管理人員、工廠保健委員會及為工人所選舉的數萬社會勞動保健人員有系統的檢查行政管理如何遵行蘇聯勞動法。社會勞動保健人員有權建議企業的行政當局關於在勞動保健和技術安全上，實行必要的辦法；而職工中央委員會的技術人員則對不實行勞動法，不實行社會監督人員公正的要求的犯罪者，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

職工會向企業的經濟工作者提出關於住房建設、企業的住房基金補充及幫助工人、職員等問題，這是給工人、職員建設私有房屋、菜園、幫助建設幼稚園、托兒所及改善勞動者的其他生活問題。按

照企業的真正可能，職工會在集體的合同加入關於行政管理的具體義務的條文，這些義務是根據工人和職員的文化、生活必須設備的一切問題。不干涉行政管理的直接任務，職工會可以檢查這些義務的實行及幫助行政在勞動需要方面設備很好的機構。

簽訂集體合同的時候，或者在上級職工聯盟及經濟機關決定他們工作的時候，有時會發生爭執的。

例如：不久前在莫斯科一個工廠中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就是一批高度熟練的旋盤工人曾被派去執行需要較低熟練的工作。工人的這種調動，如果對生產是需要的話，在蘇聯的法律上是允許的，但在此種情況下，還保持工人以前的工資。可是，當到了領取工資的時候，所付予這些工人的工資，不按照以前的評價，而按照更低的、按照所完成的工作而付給工資。工人們對車間主任提出這個情況，主任回答工人，付予工資的不同，是由於經費的缺乏。工人在工廠管理方面所得到的回答也是如此。於是工人又到職工委員會那裏去上訴。

行政管理的行動有不合法的，工廠委員會將工人的控訴轉交給調停爭議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由行政及職工會以同數的代表在平等的基礎上組成的。他們討論關於不合理的開除工人的聲明，行政上不合理的處罰，不合理的付予工資、額外工作的應用、不給工人工作服等。調停爭議委員會的決議工人及行政方面都必須執行。

討論上述工人聲明以後，調停爭議委員會解決了工人利益問題，車間主任將工資算好付予工人。如果沒能作到這一點，工廠委員會可將調停委員會的決議轉交到人民法庭，而由法庭決定付給工人工資。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

德米特里·普琴科作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開啓了生產合理化和生產力不斷地、經常地迅速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構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經濟以及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被自然法則所推動和受敵對階級的矛盾所挫折，按它本身性質說來，是一種浪費的經濟。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使生產力的掠奪，和每逢規律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重現的時期中，大批人類勞動生產品的破壞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它引起那些侵略的，不義的戰爭。這戰爭帶來了前所未見的領土的破壞和荒廢，毀滅了數百萬的人類勞動的創造物。它爲了滿足資產階級的窮奢極慾而任意浪費生產力。

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目的不在滿足勞動者的需要；它的商品的生產是爲了增加資本家的利潤。資本家爲了利潤而經常努力追求生產費用的最大的降低。而這樣降低的方法不論怎樣巧妙，它歸根結蒂，必然加強了對資本的僱傭奴隸的剝削，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準而增加了失業者和貧困。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它的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對經濟方面做有計劃的指導，所以它本質上便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和失業，從而——在嚴格遵守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的條件之下——也

消除了生產力和人類勞動生產品的掠奪了。

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領導對於引導一切國民經濟資源進入生產，對於這些資源的最大經濟與合理的利用上，啓發了廣大的可能性。

自發而盲目地支配着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引起社會生產力的大量浪費的價值法則，一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便變了樣。它變成了計劃經濟的工具。價值法則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的服從，和正確而自覺地利用它作為計劃經濟的工具，這事，在減低生產費用和節省人力的與物力的工作上，有了極大的可能性。從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以較少的物質和人類勞動而創造較多的生產品這事便大見可能。它本身包含着為全力加速生產的增加並增殖社會的財富，以提高人民物質上的幸福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切必需的條件。

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經常地強調教育蘇聯人民節省社會的物質，對一切方式的浪費公共財產的不妥協精神的必要；他們教訓大家細心地處理社會經濟，毅然排斥不合經濟的情形，保護社會主義的財產不受任何侵害。

節約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方面負着重大的使命。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的實施是以殘酷的剝削人民，劫掠殖民地，賠款，借外債等等為手段的。蘇維埃國家當然不能走這一條路綫。它的實施社會主義工業化所賴的是國內的資源，而最經濟的利用它們。斯大林在總結第一次五年計劃時說：

「確立最嚴格的節約和積蓄，對於我們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財源——這便是要達到建立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應採的路綫。」

「勇敢的任務嗎？艱難的路綫嗎？但是我們的黨正因為它沒有權利畏懼艱難，所以叫做列寧的黨啊。」（見「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版三七二頁）

列寧與斯大林的關於最嚴格的節約的指示，對於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計劃的實現上，是有最重要的意義的。

在偉大的祖國戰爭的年間，蘇維埃國家靠了節約，才能在動員物質和金錢以供戰爭需要的方面獲得了顯著的成就。

在最近的時期中，最嚴格的遵守節約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部門裏，帶着新的力量出現了。戰後的五年計劃包含着復興受到法西斯德國侵略者蹂躪的區域和經濟的與文化的將來的建設上的龐大的計劃。

五年計劃提出這樣的任務——保證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往後技術上的進步作為生產的有力的增長，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國民經濟裏今後生產費用與經濟的降低的條件。

蘇聯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國民經濟的復興和發展的五年計劃的法律要求：「……增加經濟組織對於國內資源的動員，對於節約和斷然消除因不經濟生產的支出而生的損失等的注意。」我們當前的任務是：徹底利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切可能性來廣泛地實現所有經濟的與文化的的生活部門中的節約，並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

去年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一年計劃的完成達到了很大的成功。一九四六年內，蘇聯的工業大體完成了工業生產的戰後重建。一切工業的生產品總額在日用生產品方面，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蘇維埃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蘇聯許多地方的嚴重旱災的惡果。這一年內，在蘇聯實

易的發展和財政與貨幣流通的鞏固方面有不少的成就。

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工作計劃更為龐大。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國家預算的法律和部長會議的關於復興發展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國民經濟國家計劃的決議，都規定大規模進一步發展國家的國民經濟與文化措施。問題在於如何能更經濟地與節省地利用物質的與金錢的資源，並因此而加速經濟建設的速度。

我們的國家盡一切可能以求因淪陷而受損害的地區迅速恢復工業，運輸與農業，加快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

國家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促使恢復了的和新建的工廠，鑛場，熔爐，馬丁爐等能更快地開始工作，責成結束建築上的材料的浪費。目前，破天荒敏銳地被提出了一種與損失作鬥爭的任務，這損失是國民經濟因物質，特別是設備的被凍結而蒙受到的。例如衆所周知的，在建築所和企業裏，堆積了許多沒有規定的器材。國民經濟有正常理由要求建設家加緊使新的力量開始工作和增加生產品的出產。

為求高速度發展的保證必須也着重更好地利用已開工的設備。這裏有着多量的預備品。譬如在頓尼茲鑛區，在一九四六年底，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的鑽鋸機器，百分之二十二的傳送機器，百分之二十六的電氣運輸車都沒有工作。頓尼茲鑛區的鑽鋸機的生產力平均每月還不足二千一百噸。

設備的充分利用，是與企業裏的勞動的準確的組織，和它的最大合理化地與經濟地利用二者直接關聯的。

在計劃充分使用設備方面，有許多的企業往往採用所謂平均標準的有害的習慣，這種標準是以較低下和落後的指數為依據的。

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產生了社會主義生產的新的英雄們。普遍知名的機械工蓋拉辛·扎布羅什茨使鑽掘機的煤的生產力月達一萬五千噸。鑽掘機工人費奧道爾·齊及耶夫在一九四七年一月裏掘了一萬六千噸以上的煤。

向前進工人看齊時，煤的生產不但可以完成政府在一九四七年所規定的每架鑽掘機平均每月開採三〇五〇至四七五〇噸的生產標準，而且還可以超過它。

節約的最重要的源泉是材料，原料，燃料和電力的節省。我們的工業具有實現這種任務的巨大的可能性。例如，在金屬製造工業裏，改換各樣零件的刻印，取消堅固料的不需要的儲藏，在壓力下鑄造等等的辦法，可以節省幾十萬噸的金屬。只要舉出這樣的例子：在「赤色無產階級」車床製造工廠裏，改換約八十樣的零件刻印，這一項生產就節省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金屬，而勞動生產力也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節約的另一重要源泉是生產的合理化，工程技術方法的改善，生產制度的加強。在這方面，我們的許多企業已獲得了很重要的成功。

跟生產裏的缺點和不生產的消耗作鬥爭，對於成功的實現節約方面，有着很大的意義。事實說明在許多企業裏缺點還是很多很大。在農業機器製造部裏的企業裏，由缺點而損失的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個月裏，達二億一千五百盧布，而不生產的支出達一億三千二百萬盧布。若干經理人員顯然不知道國家因生產的缺點而受了很大的損失。用加強生產的與工程技術的紀律，更妥當地使用設備和材料，以及提高工人的素質等方法來消除缺點也可增加生產品的出產，為國家節省了數億的盧布。

節約需要物質的動員和不能容忍物資財寶的僵化。例如有色金屬冶金部的波谷司洛夫斯基鋁工廠

的建築時，物質的儲藏在一九四六年的九個月裏增加到一千萬盧布，但按計劃他們只需增加到五十萬盧布。在這建築裏擱置着它所需要的價值三百萬盧布的二百六十五架起重機，它們還是一九四四年運進去的。

另一個組織的經理人以接收更多的材料，儲藏起來為得計，一藏好幾個月或幾年，却不管規定企業儲備的材料是生產上所必需的東西。這麼一來，多消耗了許多銅幣。這些人的這樣做法使物質僵化，延緩它們的週轉，因此延誤了生產的進程，使企業的財政經濟紊亂，引起很多的損失和不生產的消耗。

節約要求行政管理機構的合理化與完善化，清除它的不必要的小組，減少職員，並騰出勞動力來從事生產，減削企業裏，運輸裏，貿易裏行政管理費和雜費，以及誇大的報告。蘇聯一九四七年的預算規定減縮行政管理機構的數額和它的維持經費。

節約的基本指數是減低生產品的成本，提高企業的工作收益，確立經濟的計算。企業的工作的標準的領導要求它的領導者，懂得生產的經濟、財政，懂得每個製品按成本的基本原素——工資、原料、燃料、電力，折舊數與管理費——計算的實際費用。

蘇聯部長會議指出航空工業部，運輸機械製造部沒有實行政府的關於清除不生產的消耗，減少缺點和關於不得過多支出工資與材料的決議；並責成那二部在它們的企業與建設裏實施最嚴格的節約。問題在於以全部毅力來實行政府所規定的減低工業生產品的成本，減低建築的費用，鐵道水道，航空運輸的成本，減低流通的費用等的計劃。

節約的本身把國家的利益和各個企業的，也和工人的工程技術，工人的與企業領導者的私人利益

結合在一起，企業組合越優良地，越經濟地，越節儉地工作，它獲利也越多，它的工人們在物質上的鼓勵的根據也就越大。

業務處理的紊亂、浪費，材料的保管與登錄的無秩序都可以使節約方面的一切措施變成徒勞之事。事實證明物質財富的損失還是很大。有些怠慢的經理人員顯然忘記了托付給他們的國家財產，他們保管這些財產是對國家和人民負着責任的。

節約不能自動地進行的。它的每一點的實現需要堅韌、毅力和在蘇聯經濟的每一環節中為了樹立社會主義的經營方法而作的有系統的鬥爭。為節約而鬥爭，一方面需要黨組織在企業中的真正的領導性和布爾塞維克的英勇；另一方面需要經營人員在生產的領導中經常改進。

「我們有些經理人員至今還不懂得列寧和斯大林不斷說起的節約，它並不是一種短期的運動，而是社會主義特有的經營方法。蘇聯人民必須永遠記住這些指示，並且毅然拿它們來做自己工作的指南。」（日丹諾夫語）

蘇維埃人民視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為完成和超過計劃的鬥爭成為蘇維埃人民的高貴的傳統，他們以極大的熱誠接受了復興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為完成這個計劃，蘇聯人民必須克服不少的困難。蘇聯人民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之下，為了更迅速地實現規定的計劃——它的成功關係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此後經濟力量的鞏固和人民幸福的增進——越來越大地發揮着自己創造的能力。

徹底地和堅決地實施節約時，蘇聯人民就可達到為實現戰後五年計劃的偉大任務所需的源源不絕的新儲備材料的發現和動員了。

實行最嚴格的節約制度

蘇聯真理報社論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階段上，斯大林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指示出經濟地使用燃料、原料和材料，節約開支，以及同浪費作鬥爭的非常重要的意義，要求「以認真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從事這一事業，建立起最嚴格的節約制度」。

在許多企業中，黨的組織在進行着有系統的鬥爭，反對浪費，力求節約。斯大林格勒「紅十月」工廠的黨的組織，首先在工廠裏廣泛的展開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產量的運動。這些問題已成爲各車間的黨和少共組織底注意中心。

由於進行了廣泛的解釋工作，用具體的例子表明了節約的可能性和實現各種不同的組織的技術的措施的可能性，「紅十月」工廠在成本上今年已比去年多降低一千萬盧布。節約了數千噸鋼、重油和數百萬瓩小時的電力。

在古茨涅次冶金公司的布爾塞維克的發起之下，召開了使生產獲利和討論節約方法的會議。在古茨涅次公司中製定了並實現了降低成本的組織的技術的措施計劃。一切這些措施皆已獲得實際的效果。五個月的工夫，古茨涅次公司不僅已不領規定的補助金，而且得到了六百四十萬盧布的利潤。

列寧——斯大林少共團——黨應積極助手——現正猛烈展開節省原料、燃料、電力的運動。在少共團員底發起下，在各個工廠裏建立了特別的崗哨，以監督材料的耗費和設備使用是否正確。許多工廠底少共團員，提議審查舊的材料耗費標準。這種具有重要政治經濟意義的發起，值得我舉國一致的

注意，並要求用一切方法和從各方面加以支持。

蘇聯農業機器製造部，贊助少共團員底提議，頒佈了關於減低材料耗費標準的命令。扎保勞茨「公社社員」工廠出產之「斯大林人——六」式康拜因機在過去要用三千六百八十公斤展鐵，而按新的標準——則為三千六百二十二公斤。曾別列茨工廠製造制草機，在過去要用九十·五公斤金屬，而現在——則為八十八公斤。羅斯特舍爾馬史工廠過去製造一架五體機器架，需九百八十六公斤，而現在——則為九百二十六公斤。在其他的材料上，消耗的標準也縮減了。

節約制度——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方法，是動員補助的資源以利我們建設的巨大源泉。然而我們還有不少這樣的工廠、電力站和鐵路，那裏還沒有把節約制度變成一種工作制度。這裏黨組織也要負不少的責任，它們在實行監督上十分不夠，也不會重視這一部門工作。

鐵路是煤的最大消費者。在許多鐵路上，對於這種以極大的勞動代價而得來的燃料，非常浪費。奧姆鐵路在去年一年和今年的四個月內，燒了二十七萬七千噸煤。斯維爾德洛夫鐵路，在同一時間內燒了二十六萬七千噸煤。難道這樣驚人的事實不正是對這些鐵路的黨組織和那些對於燃料的浪費熟視無睹的領導者的教訓嗎？

國家供給機關所進行的檢查證明了：運輸機器製造部底某些工廠，其所領到的金屬，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合理使用的。該部底里阿諾佐夫工廠超用了將近八千噸的金屬。重工業建設部的工廠中，超用金屬達一萬一千噸以上。這些企業底黨組織，減弱了對經營活動的監督，沒有防止如此重大的在金屬上的損失。

多燒燃料，多用金屬，不合理地使用各類的原料，不經濟地使用材料，超出開支，這一切證明

着，在相當一部份的經濟工作中間，非布爾塞維克的氣質還活躍着。另一工廠經理，毫無監督的支配國家資材，不加計算地用去這些資材。黨的組織沒有認真地來教育這些類似的經濟工作者，不同那些繼承了把國家財富看作「公家的一因而不加愛護的習慣的人作鬭爭。

節儉——是共產主義者底特色。節儉教育——是羣衆政治工作的重要要素之一。黨的組織應當完全掌握說服羣衆的藝術，用具體的事實和例子向工人和職員說明，對人民財產抱不愛惜的態度將使國家遭受如何的浪費，從而在生產中造成何等的損失。政治鼓動應當具有戰鬥的進攻的性質，應當廣泛指明節約的方法，把先進工人、工程師、技師底經驗廣爲傳佈，他們是以自己的精力和倡導精神促成了縮減生產消費和降低成本的。

工人集會，生產會議，黨底小組，報紙，地方的無線電廣播——一切都應當爲了達到節約目的而使用起來。當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其他城市底黨組織，以非常鮮明的圖表形式表明：由「小事」造成怎樣嚴重的損失的時候，應當推廣這種一目了然的鼓動工作的經驗。

爲節約而鬭爭，不是什麼定期的短時的運動。它應該有機的與企業工業，鐵路，水上運輸，電力站，農業底日常工作聯繫起來，應當受黨組織底經常注意。實現節約制度——這就是首先要以共產主義的自覺的精神教育羣衆，要啓發他們節約的意識，要促進生產的改善和提高企業的產品。黨底組織不能也沒有權力去干涉工廠，鐵路和電力站底具體的經濟工作。

實行核算制度，善於重視每一個蘇聯哥比，堅決打破舊有的過高的電力、原料、材料、燃料消耗標準——所有這些，毫無疑義的，將得到顯著的節約的效果，將加快我們建設的速度，促成戰後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

（按之譯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真理報）

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阿·里雅萍著

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乃是社會主義底規律。我國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以及經濟與軍事力量的鞏固，都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表現。

列寧會寫道：「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與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時代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可以創造新的更高度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百四十二頁）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對列寧這一原則更加以發揮地說：「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應當而且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呢？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夠創造出更高的勞動模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夠給予社會更多的產品，能夠使社會更富足。」（見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九四頁）

什麼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呢？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是指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變革，就是縮短商品生產的社會必須勞動時間。換言之，高度的勞動生產率能夠以較少的勞動時間，而生產較多的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大小，可用下列公式表示之：

勞動生產率（P）等於以實際所費勞動時間（T）去除生產產品底數量（M），或 $P = \frac{M}{T}$ 。

所以，生產量（M）越多，所費勞動時間（T）越少，則勞動生產率越高。反之，生產量（M）越少，所費勞動時間（T）越多，則勞動生產率便越低。

馬克思寫道：「在集體生產條件下，時間的概念，當然是有其重大意義的。社會在生產小麥，牲畜等方面所需之時間越少，那末用於其他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方面的時間則越多。無論就個人或社會來說，其發展的程度，消費的規模與活動的範圍均決定於其對於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省，歸根結底都是時間的節省。」（見馬、恩文存第一卷第一一九頁）

勞動生產率是由下列許多條件決定的：即科學、技術底發展水平，社會生產組織，生產手段的數量及其生產能力，工人的熟練程度和自然條件等等。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最重要條件，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增長與鞏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乃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手段，剝削工人階級的工具。雖然機器本身可以減輕人的勞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却變成了延長勞動日，增加勞動強度，及採用女工童工的手段。資本主義工廠裏的工人，乃是機器的單純附屬品，他們在一生中都操着同一的動作。這樣的情況，只能降低工人的工作技巧，剝奪工人的創造性，而在精神和肉體上奴役並摧殘工人。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情形則完全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機器不是剝削的工具，而是減輕工人勞動與提高工人勞動生產率的有效手段。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工人已不是機器的附屬品。而由操作局部工作的工人變成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工作者。社會主義社會所實行的勞動分工與專門化，並不是使工人成爲「殘廢」，而是使工人去掌握技術，有系統地提高工作的熟練程度，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

水平。

沒有新技術便不可想像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特點之一，恰正是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提高的新階段。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就是表現創造的主動性，尋找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成爲生產中的革新者。他們正在學習掌握各種相近的業務，採用新的生產方法，改進技術。

與主要依靠增加工人勞動強度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資本主義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技術裝備的增設與改進，依靠可以減輕工人勞動與提高工人生產率的生產底機械化。

蘇聯在工業底技術裝備方面，過去和現在都作過很多努力，這是衆所周知的。差不多沒有一個工業部門，是在戰前數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與衛國戰爭期間，沒有不斷增加其技術裝備的。現在我國一切工業與農業部門都擁有最豐富的技术裝備。

現在新五年計劃又規定，要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更進一步的發展技術；規定在生產中實行廣泛機械化與電氣化，在工業中廣泛採用最新最完善的機器與車床，在許多生產部門中採用新的現代化的技術，在蘇聯整個工業中，工人的技術裝備在五年計劃期間要增至一倍半。所有這一切，便爲減輕勞動，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創造了便利的條件。

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提高勞動人民一般文化教育水平。勞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越高，他們掌握新技術與提高勞動熟練程度亦越快。

共產黨，蘇維埃政權保證了蘇聯一切人民文化水平的巨大增長。在蘇聯進行了真正的文化革命。這一革命席捲了城市和鄉村，囊括了各個階層，培養了大量的人民知識份子幹部，提高了勞動人民一

般文化教育水平。在蘇聯實行了普遍的初級義務教育。在高、中學校學習的人數大為增加了。工廠職工學校，工藝學校，技術訓練班等，都有廣泛的發展。

新五年計劃規定，要廣泛發展科學研究，要在工業與農業中迅速採用科學與技術的成就。為要加速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黨與政府正特別注意於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擴大科學研究院，實驗室等工作。

蘇聯人民並沒有停止在既得的成績上，他們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下正繼續前進，以便在改進工業技術裝備及普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方面獲得新的成績。由於實行戰後五年計劃的結果，使我國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工業技術與文化方面更前進一步。黨與政府對提高蘇聯全體勞動人民底知識文化水平，對提高一切工業及農業部門中幹部底工作技術賦予頭等意義。斯大林同志指示道：「為要運用技術，並澈底利用它，我們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員，需要有善於掌握並巧於利用這種技術的幹部。」（見列寧主義問題四九〇頁）雖然近幾年來，蘇聯在解決這一任務上是大大地前進。但為了要培養與訓練大批能掌握技術並巧於利用技術的幹部，還需要作很多工作。

澈底實行社會主義的勞動分工原則，正確的規定工資，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均起着重大的作用。依照工作的數量與質量給予勞動報酬的原則，足以刺激工人，使工人願意將工作做得更好，願意充分使用其勞動日，不使生產中斷，改善對於機器裝備與工具的使用。

提高勞動生產率底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正確利用勞動日，提高勞動紀律，並具有良好的勞動組織。勞動時間的浪費越少，勞動日利用得越充分，勞動生產率就越高。

馬克思曾說道：「在這裏造成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或者是由於增加一定時間內的勞動力的支出，即增加勞動強度，或者是由於減少非生產的勞動力底消耗。」（見馬、恩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七五

各企業、各集體農莊中正確的勞動組織——對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重大意義。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原稿中寫道：「……對於蘇維埃政權說來，各企業與各村公社內的勞動組織，乃是整個社會生活最重要的根本的迫切問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二—四一三頁）列寧要求對勞動組織實行廣泛的社會監督，要求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省人力勞動的實際辦法上發揮羣衆的主動創造性。

斯大林同志曾非止一次地指出了正確的勞動組織之意義。連在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同志即曾指示經濟工作人員，必須「……使工人在這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即使他們有可能好好地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因此，必須在各企業內適當地組織勞動，以便生產率能夠逐月逐季地提高。」（見列寧主義問題三三七頁）

正確的勞動組織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條件，就是製定技術定額。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沒有技術定額，就不能進行有計劃的國民經濟。技術定額能夠將落後的工作者提高到先進工作者的水平。它可以將廣大工人羣衆組織到生產先進份子的周圍。

規定技術定額，就使我們能夠根據完成生產成品的條件計算成品定額。這種定額就叫做技術（或計算）定額。它可以使每個工人確定自己每天的工作任務。每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一班或一小時）所應完成的成品或工作數量，就叫做成品定額。

正確的規定技術定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方法。但在許多企業中對於規定技術定額還很不注意。在某些企業中，臨時的根據經驗統計所規定之定額，仍佔統治地位。這些定額是不符合於現

在業已達到的技術與生產組織水平的。它在工人的勞動報酬方面造成了一種平均主義，因此便不能刺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爲了很好地利用先進工人所已達到的成就，並提高各企業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必須對產品定額定期地進行重新審查。因爲對於產品定額進行重新審查，可以刺激羣衆底主動創造性，可以鼓勵羣衆採用新的更完善的勞動方法，並採用先進的生產技術。新五年計劃中規定：「根據先進技術與日益提高的勞動技術裝備，要在工業部門內廣泛採用技術定額。要保證由有經驗的工程師與技師幹部來規定勞動底生產定額。」

許多企業部門已採用先進的，累進的技術定額，這在爭取完成並超過生產計劃上，具有重要的組織與動員作用。我們的計劃不應根據生產（其中包括落後的生產部門）中所已達到的算術上的平均定額來製定，而應根據與先進工人，先進車間及先進企業的經驗相結合的平均累進定額來製定。

一九四七年，在蘇聯各企業部門內，對於重新審查陳舊過時及過低的產品定額，及在生產中採用平均累進定額，曾進行了巨大的工作。採用新的先進定額，乃是動員社會主義生產內部資源以加速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正確規定農業中的產品定額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因爲沒有產品定額，就會走到，如黨所指責的，使勞動報酬平均化的方向去。而陳舊與過低的產品定額，就會浪費集體農莊的勞動日，浪費國營農莊與機器托拉機站的國家資財，並阻礙勞動生產率的繼續提高。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二月全會決議指出，必須於最近期間內重新審查產品定額，及評定各種工作底勞動日報酬，保證對最重要的工作有較高的勞動報酬；次要的工作，則勞動報酬較

低。

這些措施在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與組織提高國民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方面，均起着重大作用。

蘇聯在改善勞動組織，加強勞動日與鞏固勞動紀律方面，均已獲得巨大成績。在和平建設時期，蘇聯勞動人民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下，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運動，斯達漢諾夫運動，並在勞動中表現了自覺性，自我犧牲精神與英雄主義的模範。蘇聯人民曾以高度的熱情建設工廠，發電站，煤坑，鑛井，鋪設道路，開鑿運河，發展國營農莊與集體農莊的生產。斯大林同志在其所著「偉大轉變的一年」中，於論及勞動生產率方面的成績時寫道：「……只有千百萬羣衆的勞動高潮與勞動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有蒸蒸日上之增長，沒有這種生產率的增長，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最後戰勝資本主義。」（見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五頁）

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期間，我國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份子會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與勞動地工作着，他們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意識，和對於全民利益的深刻關懷。祖國永遠不會忘記工人階級在衛國戰爭時期所作之偉大功績，不會忘記蘇維埃知識份子在擊敗敵人的事業上所作出的寶貴貢獻，及集體農民在戰勝希特勒德國的事業上所給予的積極幫助。祖國永遠不會忘記蘇聯婦女與光榮的青年們所作之史無前例的勞動功績。他們代替了自己的父親，兒子，丈夫與兄弟們在車床與機器，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的工作，他們肩負起了主要的勞動重担。「我國人民有權享受「英雄的人民」這一光榮稱號」。（斯大林語）

由於蘇聯人民的勞動功績，使得蘇聯能夠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獲得偉大的勝利。

戰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斯大林五年計劃，又喚起了蘇聯人民新的勞動高潮。在工廠，在運輸方面，在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中，在全國廣泛地展開了爭取完成並超過五年計劃的，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競賽。千百萬人民都充滿着從事創造性勞動的熱情。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底威力與偉大力量，以自我犧牲精神克服戰後困難的蘇聯人民，正順利地循着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

根據上面所述勞動生產率增長的事實，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制度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着如何巨大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制度已保證實現了革命前舊時代所不能達到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在沙俄時代，由於技術、經濟的落後，使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低好幾倍。列寧曾指出，在一九〇八年，俄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較一八六〇年，奴隸勞動尚佔居統治地位的美國還要低。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國內戰爭時期，勞動生產率更劇地下降了。在一九二〇年，每一個工人的產量僅等於一九一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在經濟恢復時期，當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曾作了巨大的努力，結果使我們在一九二六年便已遠不償還到而且超過了戰前水平。但這僅僅是舊俄羅斯的水平。爲了克服這一落後性，還必須急速地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蘇聯實行數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由於國民經濟進行了技術改造，由於動力裝備與勞動機械化的增長，工人階級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與斯達漢諾夫運動的開展，勞動生產率已遠遠地超過了沙俄時代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在一九三七年，蘇聯工業中每個工人的總產量較一九一三年平均增加三點三倍，而每一工人每小時的生產量（根據勞動日的長度來計算）實際上則增加四點五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又提高了百分之八

十二（原規定為百分之六十三）。第三個五年計劃規定要繼續提高勞動生產率，工業部門要提高百分之六十五，建築部門（百分之七十五，鐵路運輸——百分之三十二，水路運輸——百分之三十八。這就是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工業產品總計要增加八百八十五億盧布，其中預定由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之產品，為六百二十億盧布，其餘則由增加工人數量來取得。因此，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如果平均產量增加百分之一，那就是增加九億五千四百萬盧布。

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於蘇聯國民經濟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根據上述材料亦可清楚了解。此即如果勞動生產率在一九三七年仍停留在一九二八年的水平，那主要完成大工業部門所達到的生產量，就需要再增加八百萬職工。

社會主義制度，是擁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潛力的。在資本主義的俄國，於十三年間——由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三年——其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僅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而社會主義工業同樣是在十三年間——由一九二八至一九四〇年——其勞動生產率則增加了三倍半。

若拿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蘇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情形則是這樣的（假定一九二八年為一百）：

年	代	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七
蘇聯		一〇〇・〇	一三六・七	二四九・七
美國		一〇〇・〇	八四・六	九七・八
英國		一〇〇・〇	一〇六・九	一三四・〇
德國		一〇〇・〇	一〇〇・七	一一四・七

這些數字證明，蘇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遠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期間，蘇聯的勞動生產率增達二點五倍，而英國在同一時期則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德國僅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七。

蘇聯不僅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方面，而且在工業及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均獲得巨大成績。

在一九三四年，蘇聯採煤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已超過法國與比利時，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超過世界最老的煤產國家之一——英國。在一九三七年，蘇聯一個採煤工人的年產量為三百一十五噸，英國——三百一十四噸，法國——一百九十五噸，比利時——二百三十八噸。

在一九三七年，蘇聯黑色冶金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已居於歐洲的首位。同樣，在一九三七年，蘇聯每一個煉鐵工人的鑄鐵出產量為七百五十六噸，而英國則為五百一十三噸；蘇聯每一個煉鋼廠工人的鋼產量為四百六十噸，而德國則為四百零六噸。

在農業方面，勞動生產率也有巨大增長。農業的集體化及農業的高度機械化，以及斯達漢諾夫工作方法的採用，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創造了一切必需的條件。

農業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明證，就是穀物總收穫量與商品穀物的增加。在衛國戰爭開始以前，我國農業的穀物總收穫量已達到七十二億普特，甚至沙俄在一九一三年最豐收的一年，穀物的總收穫量也不過是五十億普特。如果說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農業中的穀物商品產量為百分之十三點三，那末近幾年來，穀物的商品產量則已達百分之四十了。這就使蘇維埃國家能夠作必需的糧食與原料儲蓄，並以此而鞏固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力量。

如果拿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小的個體農民經濟底勞動生產率與一九三七年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相比較，那末就可以看到，農民用於穀物生產的一個勞動日，在中、小個體經濟中可以生產三十一點一公斤，而在集體農莊則可生產九十八公斤。由此可見，在集體農莊制度中，勞動生產率於一九三七年即已增進前者之三倍以上。

總之，在我國和平建設時代，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勞動生產率，都是一直上昇的。而高度的勞動生產率，乃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繁榮蘇聯經濟與鞏固蘇聯國防的最重要的條件。

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時期，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方面也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僅僅在由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的兩年間，在蘇聯一切工業部門內，勞動生產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在軍工部門內，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百分數還要高。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〇年相較，平均每個工人底彈藥出產量增進二倍半，在砲兵工業部門內，勞動生產率增進二點二倍；在軍工企業中，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工人完成了產品定額的百分之二百以上。

戰時勞動生產率的高速度增長，在農業中也很顯著。集體農莊制度是使勞動生產率空前高漲的源泉。關於這一點，僅就下列一事即足說明。如在許多集體農莊，儘管戰時存有許多困難，但每個有勞動力的集體農民仍生產了較戰前多一倍半至兩倍的穀物。

這就是蘇聯勞動人民在衛國戰爭時期奮不顧身工作的結果。「可以有一切理由地說，蘇聯後方人民底獻身勞動，將與紅軍的英勇鬥爭一起，作為人民在保衛祖國事業中所作之偉大功績載入歷史。」

（見斯大林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第一一六頁）

戰時勞動生產率之所以能夠達到高速度之增長，是由於我們具有良好的勞動組織，和具有高度生產力的工具，是由於實行了生產技術的改革，與機械裝備的增設，勞動的機械化，流轉式生產法的採用，以及工人階級，集體農民與蘇維埃知識份子生產積極性與勞動熱情的增長。

蘇聯勞動生產率的高速度增長，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優越性與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組織的優越性的鮮明表現。

目前，在和平的經濟文化建設時期，蘇聯勞動人民正在努力爭取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動員社會主義勞動中的一切潛力並發揮其優越性。

莫洛托夫說道：「爲着使蘇聯人民在勞動生產率及其工作質量方面得到最好的成果，對於如何更正確地組織工業，農業，運輸業及一切機關中的勞動，必須加以更多的考慮。」

蘇維埃國家的戰後發展時期，要求工業與一切農業部門迅速擴大生產工具底生產與消費品底生產。要達到這一點，主要的是要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組織的改善，工人勞動熟練程度及人力勞動的進一步機械化。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如在一個生產班，一星期，一月之內）所完成之產量越多，完成生產任務所需之工人數量則越少。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縮短產品生產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高度的生產率，能够使我們以較少的勞動時間，出產較多的產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加現有各企業之產品生產，又是爲建設新工廠而進行社會主義資金積累的源泉。同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照例是與很好地利用原料，燃料，電力，與大大減低產品成本等相並而行的。

戰後五年計劃規定，在一九五〇年，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要較戰前水平提高百分之三十六，建

築業方面，要提高百分之四十。在實行新的五年計劃期間，在工業產品的總增產量中，有百分之七十，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來達到。

一九四七年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即是建築在繼續提高勞動生產率與降低產品成本基礎上的。它規定工業部門內的工人勞動生產率，應較一九四六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建築業內應提高百分之十一。這一國家計劃所規定的關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數字，不僅可以，應當完成，而且可以並應當超過。涅茲涅辛斯基說道：「在生產機械化基礎上，改善勞動組織，提高戰災區業已復原之各企業部門內工人勞動熟練程度，就可以以現有的勞動人民數量，於最短期內擴大生產至一倍半以上。這就是我們的後備力量，我們必須利用這些後備力量。」

關於我國各企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究竟存有如何巨大的後備力量，可由我國各國民經濟部門內生產組織所達到的成就來說明。

就拿流轉式生產法的例子來說吧。由於工業中採用流轉式生產法的結果，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及改進技術、經濟標準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績。採用流轉式生產法，可以使我們能够在機械裝備與工人數量減少的條件下，增加產品產量。這一點，是由於流轉式生產中具有良好的生產組織所促成的。以前，在許多企業中，機器裝備是按照鑰盤機，削齒機，鑽孔機等機器的種類而分別按置的，所以半製成品必須由這一工廠轉運至另一工廠，而在流轉式的生產中，機器裝備則是按照生產的技術過程而裝置的，這樣就大大縮短了半製成品的運轉時間。這些半製成品也不再需要反覆搬運了。它們像流水一樣地移動着，繼續不斷地受着各種形式的加工。現在工人已經免除了多餘的動作，免除了將半製成品搬起來，轉運到另一地點，又將它放下去的工作，因為這些半製品可以按照接力的方法自己由一個車

床轉移至另一個車床。因此便減少了生產每件產品的勞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流轉式的生產法，使我們能够大大加速生產過程，改善對於生產動力的利用，減少作輔助勞動的工人數量，並從而提高產量。在流轉式的生產中，工作的進行不是時斷時續的，而是有規律的，嚴格按照進度表進行的。

蘇聯各企業中還有巨大潛力未被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還有許多企業沒有完成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計劃，還有個別的工人沒有完成其產品定額；還沒有澈底消滅曠工，遲到及其他破壞勞動紀律的現象。

目前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就是創造一切條件，以便在一切企業中繼續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落後的企業提高到先進企業的水平。保證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的基本力量與決定力量，就是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一切蘇聯人民——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底積極性，自我犧牲精神與英雄主義。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給我們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就是勞動過程的機械化，有組織有計劃地招收勞動力，有正確的工資規定與正確的生產勞動組織，培養工程師、技師幹部，澈底實行經濟核算。實現這些條件，乃是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工業部門的義務。恢復與發展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建設新的企業，按照新五年計劃之規定，廣泛發展機械化與自動化，在工業，運輸業與農業中，堅決採用科學與技術的成就，大批培養熟練技術幹部，普遍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所有這一切都使勞動生產率獲致新的與決定性提高之前提條件。

為要完成國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計劃，必須經常不斷地提高工人的技術熟練程度，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克服一切阻撓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性；因為不將幹部固定於其

工作崗位，不關心經常改善幹部的物質生活條件，就不可能真正地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鬭爭中，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更高的形式——斯達漢諾夫運動起着極重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指出，斯達漢諾夫運動，「……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唯一可走的道路，去達到更高的生產率指標，即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需的勞動生產率指標。」（見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九六頁）

以堅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我們就可以迅速消滅嚴重的戰爭後果，迅速恢復遭受德佔領者蹂躪的區域，並更進一步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邁進。所以十分顯然的，為爭取在每一個企業及一切國民經濟部門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鬭爭，乃是我國黨、政、經濟組織與一切勞動人民目前最重要的經濟、政治任務。

（伊真譯自「論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一書）

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

阿·里雅萍著

如衆所週知，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恩格斯曾說道：「……分配主要是而且永遠是本社會生產關係與產品交換的必然結果，是該社會各歷史前提條件的必然結果」。（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一四三頁）

蘇聯工人與農民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着社會總產品。而社會產品是由兩部份組成的：一部份是消耗於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手段的再生產，另一部份就是新生產的產品，或是一年淨得的產品。後一種產品又是這樣分配的：即一部份用以滿足勞動者的個人消費（工資、勞動日的報酬），另一部份——剩餘產品——則用作資金積累與社會消費基金。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曾駁斥了拉薩爾關於勞動產品底「完整」或「不可分割」論。馬克思指出，爲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正常發展與正常地發揮機能，必須自社會總產品中分出如下的幾部份：即第一，用以補償所消耗之生產手段的部份；第二，用作擴大再生產的部份；第三，用作儲蓄或保險基金的部份。

社會總產品底另一部份，才是作爲消費用的。但在這部份社會產品進行分配之前，還必須再分爲幾部份，即第一部份是一般的管理費；第二部份是滿足公共需要（如學費，俱樂部、醫院等的費用）；第三部份是對失去勞動力者之補助基金。

只有把這些費用扣除以後，才能談得上在從事社會主義生產的工作人員中間分配社會產品的問題。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說道：「……從作爲一個個人的生產者那裏所得到的一切，又被直接或間接地償還給作爲一個社會成員的生產者。」（見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七三頁）

顯而易見，在任何一個發展的社會中，尤其是社會主義社會，都必須有剩餘產品，因爲如果沒有逐年增加的資本積累，社會便不可能發展。但是，與一切剝削者社會不同，在蘇聯，剩餘產品並不是對抗關係的表現。馬克思說道：「一般剩餘勞動，即超過消費者所消費之數量的勞動，將是永久存在的。但在資本主義制度與奴隸制度下，剩餘勞動則帶有一種對抗的形式，並且，在這些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完全是寄生者。」

如衆所週知，在社會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階級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獲取剩餘價值的。在封建社會，獲取剩餘價值的形式，是勞役地租（出勞役），實物地租（徵收實物）與貨幣地租。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家則是以剩餘價值的形式及剩餘價值的變態形式——商業利潤，利息，地租，分紅等形式獲得剩餘產品的。列寧說道：「只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剩餘產品才不歸有產者階級所有，而是歸全體勞動者所有，而且也只能歸他們所有。」

在社會主義社會，剩餘產品是由那些擺脫了剝削的人民底勞動所創造的。與資產階級獲取剩餘價值不同，在蘇聯，剩餘產品是用以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也就是說，歸根結底，它又以各種形式還給了勞動人民自己。

在蘇聯，自每年剩餘產品中，必須拿出一定的數量充作資金積累。如果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工作人員底勞動，僅以滿足其個人消費所必需之數量爲限，那就不可能進行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剩餘產品

的另一部份則用作蘇維埃國家的軍費，及管理機關，文化教育機關，保健機關等的經費。最後，喪失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也是依靠剩餘產品來維持生活的。

因此，工人階級不能把自己的勞動日，僅以必要的勞動時間，與必要的勞動量為限，而必須創造剩餘產品。

剝削工人勞動為生的資本家們，總是企圖掩蓋、抹煞工人為他們創造剩餘價值的事實。

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反，它很樂於讓勞動人民知道，他們的勞動在保證着蘇維埃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為着社會的需要，而從他們那裏取得的一切，又為着他們的利益而用在他們身上；這樣既可以進一步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又可以增進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福利。

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是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在社會主義階段，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達到能夠保證生產大量消費品的水平，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便不能按照社會成員的需要來分配消費品，而必須按照他們為社會所作之工作，即按其勞動數量與質量來分配消費品。

社會主義指導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斯大林同志說道：「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每個人在工作時，要各盡所能，但在領取消費品時，還不是各取所需，而是以其為社會所作之工作為標準。」（見列寧主義問題第四九五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那時生產力已達到更高的階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就可以實現了。「共產主義的原則是，每個人在工作時，要各盡所能，在領取消費品時，已不是按其所作之工作，而是按其文化發展所有的需要」。（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〇頁）

斯大林同志說，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點的，它只能給社會主義事業帶

來極大的害處。斯大林同志指出，馬列主義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等，並不是個人需要與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一切勞動者都平等地擺脫剝削，平等地廢除一切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一切人都按自己的能力而勞動的平等義務，與按自己的勞動取得報酬的平等權利。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馬列主義的平等原則就是，一切人都按自己的能力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人民都有按各人的需要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然而，就是完美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各個人的需要也不會是彼此相同的。『……馬克思主義根據這一點認為，各個人的胃口與需要，無論按質量與數量來說，也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均等的。』

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在繼續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它是進行社會主義生產的重要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它可以保證勞動者公私利益的正確結合，可以為每個工作人員對於關心自己的勞動結果創造一種物質興趣，可以推動工作人員提高自己的工作熟練程度，可以加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鞏固社會主義經濟。

正因如此，所以必須徹底實行按照勞動數量與質量分配勞動報酬的社會主義原則，堅決根除分配勞動報酬方面的平均主義。這一原則的執行越徹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越能得到順利的發展。

工人的工資及集體農莊莊員的勞動報酬都是按照這一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規定的。在國營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原則是採取計件工資，獎勵性勞動報酬等形式而實現的。在集體農莊中，這一原則的實現，則採取按勞動日分配，及對提高收穫量與提高牲畜繁殖力有成績者給以額外報酬的辦法。

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資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工資是有根本的原則區別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資是勞動力價值（價格）的轉化形態。從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看來，工資是勞動的價格。所以工資便將資

本主義的剝削實質掩蓋起來，將兩個彼此敵對，相互對抗而不可調和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真實關係掩蓋起來。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情況則完全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資乃是國民收入或新創造的價值的一部份，是用以滿足社會主義企業中職工個人底直接需要，按照勞動的數量與質量分配給勞動者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是由社會主義國家規定的，而不是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國家決定工資水平所根據的出發點，就是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勞動大眾的物質、文化水平，一方面又要保證能獲得必要的剩餘產品，以便繼續擴大生產，滿足國防事業、國家管理機關及國家文化、保健等事業之需要。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須超過工資的增長，因為社會主義社會要發展自己的生產力，就必須生產出較其常年內所需者為多的東西。

「……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須超過工資的增長。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為保證提高工資，為增加流動資金以擴大生產，為補償磨損與陳舊的機械裝備，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為教育與培養年青的一代，及為滿足國家管理機關與國防需要而創造物質基礎，並積累資金。」（聯共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工資政策之決議）

在規定工資上，蘇維埃國家規定各個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各企業間的工資水平要有一定的差別，規定那些在目前時期內起重要決定性作用的部門與企業（如採煤業，冶金業，石油工業，及其他許多機器製造業部門）均應有較高的工資水平。

其次，蘇維埃國家規定，在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工資亦應有所不同。因為熟練勞動是一

種質量較高的勞動，它可以創造較多的價值。所以，熟練勞動應得到較高於非熟練勞動的工資。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所召開之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演中說道：「在每一個工業部門內，在每一個企業中，在每一個車間，都有一部份主要的相當熟練的工人，如果我們真正想保證企業內有固定的工人數量，就必須首先而且主要是將他們固定在企業中。他們，這一部份主要的工人，就是生產的基本環節。要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這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的流動性。可是，怎樣才能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只有提拔他們，提高他們的工資，正確地規定工資，使工作人員的熟練工作能得到應有的報酬。」

最後，在規定工資水平時，國家尚考慮到勞動條件的差別。例如從事採煤，開鑿或其他有礙健康勞動的工人所得之工資，即較一般工人之工資為高。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關於對服務年限長久，功績卓著的採煤工人，開鑿能手，採煤業及採煤建築業中的領導工作人員與工程師，技師獎授勳章及獎章」的指示，以及蘇聯部長會議「關於對採煤工人，煤業及煤鑛建築業中領導人員與工程師，技師給予較優厚待遇」的決定，都是黨與政府關心鑛坑工人需要，重視其獻身勞動的明證。

新五年計劃規定對採煤業，煉油業及冶金業工人給予較高的工資，因為這些企業中的勞動條件較其他工業部門更為繁重。

由此可知，蘇聯工資標準是由下列基本條件決定的：即生產力發展水平；某一部門或某一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工作人員的工作熟練程度；及勞動條件。

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最適應的工資形態，就是計件工資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計件勞動報酬，與

資本主義社會的計件工資是有根本區別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計件工資乃是加強對工人剝削，及提高勞動強度的方法。而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計件工資乃是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取酬原則的最好方法之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槓桿。它不僅符合於工人本身的物質利益，而且也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因為工資是由工人的生產量決定的。計件工資，就是幫助將勞動者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結合起來的一種報酬形式。如果沒有計件工資制，就不可能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突擊運動及一人管多台機器，一人兼多種職務等的運動。

規定計件工資的基礎，就是產品定額與計件工資的評定。在蘇聯各企業中，產品定額的規定，必須使其符合業已達到的技術水平，適合於生產組織，刺激勞動生產率的繼續增長。產品定額乃是正確規定工資必不可缺的條件。每種工作都按件規定一定工資，就會給工人造成一種超過完成產品定額的興趣。而計件累進工資與獎勵性的勞動報酬，又可鼓勵工人去超過完成其產品定額。

計件累進勞動報酬制，就是工人超過定額以上所作之每件產品，可以獲得較定額以內之每件產品為多的工資。實行計件累進勞動報酬制，可以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與降低生產成本。

對完成一定工作指標（如超計劃完成產品出產量，額外地節約燃料、電力等）的工人，給予大大超過一般規定工資之獎金，及工作人員所節省之物資，部份歸他們支配，也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最後，對於經濟工作領導人員、工程師、技師的給獎制度，也是極有意義的，這一制度規定，基本工資（薪水）之外，可以按其完成並超過國家計劃規定的任務，與改進企業生產質量標準之程度而給予獎金。

在聯共（布）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稱：「……在規定工資方面，必須以對工人實行計件工資制，對領導工作人員實行給獎制，及對熟練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辦法，嚴格徹底執行對工作成績優良者之物質獎勵制度。」

爲了給予勞動人民更大的刺激力，新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資制度方面，曾規定了許多重要措施：此即廣泛採用計件累進工資制，對完成並超過生產任務之職工，增加其獎勵性工資。

許多工業部門內，已經實行了新的獎勵制度，這種制度不僅對於完成計劃的數量標準，就是對於完成計劃的質量標準（降低成本，減少勞動力的浪費，節約物資，原料，貨幣資金）都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力。

在戰後時期，黨與政府曾通過了許多有關工資問題的決議。這些決議的目的，在於提高那些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各工業部門工資水平。所以石油工業與瓦斯工業工作人員底工資都提高了。同時，根據烏拉爾、西伯利亞、遠東的特殊條件，政府又將這些重要工業基地的工廠與建築業工人，工程師，技師的工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所有這些措施，目的均在於繼續鞏固作爲社會主義生產重要基礎的社會主義按勞取酬原則，並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合作經營的集體農莊企業中，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原則，是以按勞動日分配收成的辦法實現的。勞動日，是集體農莊勞動的標尺與消費的標尺。可以用勞動日來衡量各種形式不同的勞動，並按計件工資原則支付勞動報酬。

但在勞動日與工資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這些區別是由於兩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所有制——即國有（全民所有）與合作經營的集體農莊所有制——而產生的。在國營企業中，工資——計件工資與計時

工資——是由國家機關預先規定一定數目而在集體農莊中，集體農莊莊員的收入數目，則不能預先規定，因為每個集體農民收入的多寡，是由各該集體農莊在該經濟年度內所得之社會收入而決定的，是由集體農民用於生產的勞動日數量來決定的。其次，工人的工資是採取貨幣形式，而集體農民的收入，則是按照勞動日數量分配自然品與貨幣。此外，集體農民按照勞動日分得的部份產品，也可以按照個人的經濟狀況，去到集體農民市場出售。

按勞動日分配收入的辦法，保證了集體農莊正確的勞動組織，而給了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以打擊。同時，集體農莊的建設經驗證明，如果僅按勞動日數量而不根據勞動所獲得之結果去進行分配，那末按勞動日分配收入的辦法，還是不能徹底消滅平均主義的。在一九四一年蘇聯人民委員會與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規定對提高農產品收穫量與牲畜繁殖力有成績的集體農民，須給以額外勞動報酬。

但是這一關於額外報酬的決議，還沒有在所有的集體農莊內執行。在許多場合下，計算勞動日與分配集體農莊收入，還不是根據各生產隊與生產小組的工作結果，因此，與那些只想佔便宜而不誠懇勞動的份子相較，那些忠實的，積極埋頭工作的集體農民便吃虧了。

在一九四七年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決議中，於指出規定勞動報酬方面的缺點後稱：「在集體農莊底收入進行分配時，必須根據各生產隊實際所得的收穫量；在工作隊底收入進行分配時，則必須根據各生產小組實際所得的收穫量。這操作，是爲了使在獲得高額收成的生產隊與小組內工作的集體農民，能得到與此相應的較高的報酬，而在獲得收成較低的生產隊與小組內工作的集體農民，則應得到較低的勞動報酬。」

黨與政府對改善集體農莊勞動報酬支付情況的各種措施，正在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增加作為勞動標尺，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集體農民財富與鞏固集體農莊制度之重要因素的勞動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頒發指令，規定對於那些在穀物、技術作物、洋芋方面獲得高額收成，及在提高牲畜繁殖力方面有顯著成績之集體農民，機器拖拉機站與國營農場之工作人員，獎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及授以蘇聯勳章及獎章，這就再一次地說明黨與政府對各集體農莊勞動人民之斯大林式的關懷，對於迅速提高社會主義農業與牧畜業的關心。蘇聯政府這一指令，已在集體農莊中間喚起了新的生產熱潮，他們一致決定要在今年獲得更高的收成，並提前完成國家徵糧計劃。

（譯自「論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一書）

蘇維埃威力底經濟基礎

A·李昂捷夫

(評N·沃茲涅森斯基著：愛國戰爭中的蘇聯經濟)

蘇聯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的戰爭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戰爭，而其在這次偉大愛國戰爭中的勝利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勝利。在這個非凡的決鬥中，蘇維埃人民對一個強大、危險、背信棄義、兇殘、作爲世界帝國主義反動底惡勢力先鋒而行動的敵人，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能夠面對我國所遭遇的這樣嚴重的考驗和憂患。然而蘇聯屹然而立，而且不僅屹然而立，並且粉碎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蘇聯不僅在一個規模空前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它經過了武力的考驗比以前更加強大與更加堅固了。

反動的資產階級當它驚慌失措地思索這一「蘇維埃奇蹟」底神祕時，祇是再一次地暴露了其政治思想底貧乏與無力。由於不能理解蘇聯底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勝利之真正原因，資產階級——包括右翼社會黨人——的政客和政論家們便藉助於可笑的遁辭或是對社會主義國度實行惡毒的攻擊。

但是全世界上千百萬的普通人充分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底教訓之巨大的歷史重要性。蘇聯對世界帝國主義前哨陣地的勝利，已經把新的力量注入到呻吟在壟斷資本鐵蹄下的各民族底心靈中去了。這一劃時代的事變，乃是對於與資本主義奴役搏鬥的各民族之日益增長的鼓舞和決心底源泉。

誰想要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非凡作用——作爲由法西斯生番手中拯救歐洲文明的救

星——之根源與主要發條（動力）獲得一深刻理解的話，他應該讀一讀 N·沃茲涅斯斯基的書（原註：『愛國戰爭中的蘇聯經濟』，N·沃茲涅斯斯基作，政治書籍國家出版局一九四七年出版，全書一百九十二頁，定價五盧布）。這是一本嚴肅的科學研究書，其中包括經過深刻的理論分析的、豐富的事實和數字。沃氏的書對一般的經濟科學、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乃是一項寶貴的貢獻。沃氏遵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建者約瑟夫·斯大林底方法，巧妙地發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原動力 and 規律，他從這一前提出發：即蘇聯的戰爭經濟是以特有的生產與分配底規律而著稱的。這樣，蘇聯的戰爭經濟時期便構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底特殊的一頁。同時，他的結論與理論的概括在幫助我們理解統治社會主義蘇維埃經濟底和平時期發展的規律上具有偉大的價值。

沃氏對許多極廣泛的問題作了詳細的研究，舉如：戰爭前夕的蘇維埃經濟狀況；戰時的經濟改組；戰時的工業管理；農業和運輸；戰爭生產底發展；勞工組織與工資；一般的貿易和商品流通；銀行與財政；蘇維埃經濟底戰時恢復和戰後組織。

由於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底有遠見的政策，在希特勒德國背信棄義進攻的時候，我國已擁有高度發展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設備——一個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底資源和設備。沃氏引證材料，指明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結果蘇聯所達到的生產力底發展水平。蘇聯的國民收入由一九二八年的二百五十億盧布上昇至一九四零年的一千二百八十億（同種物價），或者說增加了五倍多。在同一時期的總工業產量由二百一十四億盧布增至一千三百八十五億（增加了六倍半），生產手段底產量增加了十倍。總的農業產量在同一時期由一百五十億盧布增至二百三十億盧布（尤其是穀物產量由七千二百萬噸增至

一億一千六百八十萬噸)。鐵路貨運由九百三十億噸公里增至四千一百五十億噸公里(增加了四倍半)。僱用於國民經濟中的人數由一千零八十八萬增至三千一百二十萬。

沃氏說：「祇是現在才可能充分去體會斯大林五年計劃對社會主義革命底命運之歷史意義。五年計劃乃是斯大林底天才之體現。蘇聯各民族以其勞動把斯大林計劃變為粉碎海盜式的德帝國主義的可怕物質力量。」(原書十五頁)

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簡明而生動的描述之後，沃氏指出使法西斯國家集團失敗和毀滅的歷史勢力是如何堅定不移。在這些勢力中他把首位給予具有其前後方的統一，其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統一，各民族之統一(在神聖的反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戰爭中堅固地團結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另一個勢力是被納粹侵略者奴役的歐洲各民族底解放運動，和最後，民主國聯盟底優越的潛力和資源，該聯盟之成立乃是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上的一個巨大勝利。

「然而這些會僅是潛力；必須把它們變為勝利。是蘇維埃愛國主義和蘇聯各民族消滅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決心，是蘇軍、其領袖們、指戰員們所達到的非凡軍事經驗，是蘇軍最高統帥部底英明戰略戰術，把勝利底潛力變為對希特勒德國的真正勝利。」(原書第二十頁)

蘇聯在這次戰爭中，在這次規模空前的決鬥中的勝利應歸功於斯大林底英明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領導。是斯大林底天才領導了蘇維埃人民並保證了其正義事業底完全勝利。沃氏強調共產黨在指導蘇維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在戰時一如在平時，蘇維埃經濟底指導力量乃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人類史上無與倫比的勝利之榮譽與光輝應屬於布爾塞維克黨。是不屈的堅忍，在戰爭經濟指導中的超羣的精通和達到

勝利的非凡意志集結了蘇聯各民族底一切力量以粉碎敵人。」（原書第十頁）

戰爭要求蘇聯國民經濟來一個劇烈的改造，為戰爭目的而轉變。這一過程在該書中會詳加敘述。最有教育意義的是沃氏底蘇聯戰爭經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革命前的俄國經濟之間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和各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經濟之間的比較。下列數字即足可說明。一九四零年，蘇聯大規模工業底總產量為一九一三年時俄國全部工業產量的一·七倍；同時期，工程工業底產量為四十一倍，高級鋼底生產——製造戰爭機器中的主要成分——為八十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的石油產量為革命前的俄國之三倍半。在革命前，俄國並不出產汽車、拖拉機、鋁、鎂或橡皮。在戰爭前夕，商品穀物底產量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二倍。

沃氏分析並得出蘇聯社會主義戰爭經濟和資本主義各國戰爭經濟間的基本不同，一種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間的基本不同而來的不同。

美國的戰爭經濟之特點表現在資本底集中之顯著增加上。

「天真的人們，以及常常是故意說謊者們關於美國是一個「人民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談論，只能愚弄頭腦簡單的人。只要說一說一九四四年美國所有戰爭訂貨底百分之七十五都在一百家資本主義壟斷者手中以及三十家超級壟斷者獲得這些訂貨的百分之四十九就夠了。美國戰爭經濟底不可侵犯的主人就是他們。」（原書第三十頁）

因此蘇聯戰爭經濟底推動力與資本主義各國戰爭經濟底推動力是不同的。在蘇聯，這種推動力乃是由蘇維埃人民底精神和政治上的統一及愛國主義所支持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戰爭經濟底推動力乃是資本主義壟斷分子，對於他們來說，戰爭乃是一種極端有利的生意和征服新市場的手段。

沃氏揭露所謂「國家在資本主義各國底戰爭經濟中起了決定作用」的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事實是：戰爭使政府機構尤其是它的上層機構和壟斷資本的大亨們更加密切地結合起來。在美國，一如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財政寡頭利用戰爭使政府底權力和機構更加可靠地為他們服務。因此，所謂美國底戰爭經濟是由政府計劃的斷言也是荒謬的。事實是：政府僅限於為資本主義壟斷分子獲得最有利的定貨。

「所有這些表明：蘇聯戰爭經濟原則和美國戰爭經濟原則之對立，一如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對立。」（原書第三十二頁）

沃氏描繪了一幅蘇聯戰時經濟轉變過程的生動逼真的圖畫。在戰爭的初期，蘇聯若干地區被納粹侵略者佔領了。在被德寇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佔領的地區中，在戰前幾乎住有總人口底百分之四十，而這些地區佔有全國煤產量底百分之六十三，鐵產量底百分之六十八，穀物產量底百分之三十八和糖產量底百分之八十四。戰爭底最初六個月是以巨大規模地移置生產設備到國家東部為標誌的。這種工業底東遷運動是由以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指揮的。

「成百萬的人民，成百的工廠，成萬的機器工具，展鐵廠，壓榨機，電力鏈，渦輪和摩托都在遷運。」（原書第四十一頁）

一九四一年最後兩個月是蘇維埃戰爭經濟史中最困難和危急的月份。由於戰爭的損失和無數工廠的撤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蘇維埃工業總產量已跌落到不及六月時的一半。

「在這樣的情形下，由於我們的領袖和導師約瑟夫·斯大林底頑強的意志，蘇聯各民族才能够屹立不動及隨後轉入反攻並取得勝利。」（原書第四十三頁）

早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蘇維埃戰爭工業即已恢復甚至相當大地超過了其以前的生產力。工業產量底衰落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停止，而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生產開始急劇上昇。那時候，僅在我國東部地區的戰爭物資生產即等於在戰爭開始時全國的總戰爭生產。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幾乎全世界都在計算着蘇維埃國家底「末日」時，指導我國戰爭經濟的斯大林提議起草並批准一個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廣泛建設新鋼鐵工廠以作為戰爭生產基礎的計劃。在這兒我們看到了一種對斯大林領導特徵之不屈的堅忍和對勝利的信心，勝利必須爭取的認識以及達到勝利需要斯大林式的意志和英雄努力之反映。」（原書第四十三頁）

一九四一年末，當廣大地區遭敵人暫時佔領所引起的產量下降的頂點已經過去，蘇維埃戰爭經濟即作迅速而正規的進展，按照擴大再生產的規律發展。雖然在一個縮小的地區內，這些規律却繼續充分有效。

計劃性的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主要特點是：第一、在社會主義制度底日益增長的實力基礎上迅速增加總的社會生產物；第二、產生於國民生產資本底擴大和技術進步之中的社會主義累積；第三、伴隨生產量的增加同時增加消費量；第四、國民經濟中沒有週期性發展和危機以及一種按照計劃的分配生產力的新方法。這些就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規律。它們（指上述規律——譯者）與經過無政府追求利潤和破壞性的危機而作用的資本主義再生產底規律恰成一種鮮明的對照。

計劃性擴大再生產底顯著特點已在該書中由一九四三年底經濟總結所證明，其標誌是蘇聯戰爭經濟每一部門底普遍的前進。

由於蘇聯政府所實行的上述政策底結果，在我國東部發展的強大生產設備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戰

爭期間，這些設備在撤退的工場及新建的鋼鐵廠、電力站、煤礦和戰爭工廠底幫助下，使工業得以迅速的發展。

由於這種巨大努力底結果，在一九四三年僅東部各地區的工業產量即為革命前的俄國總產量的七倍半。這些地區在一九四三年所生產的煤為一九一五年革命前的俄國全部地區所生產的二·三倍，銅為二倍，展延鋼一·七倍，銅四·一倍，鉛五十九倍，鋅一八·八倍。

沃氏陳述了為修復侵略者造成的破壞所作的英雄努力。這一工作在德寇一經被逐出之後便立即在蘇維埃領土底每一呎土地上開始了。由一九四三年開始，蘇維埃人民在由敵人手中解放的地區中之自我犧牲的努力，成爲一個使我國底用以擊敗敵人的物質資源底增長之重要因素。

戰爭使蘇維埃工業面對着艱巨的任務。這些任務得以勝任，唯一是由於斯大林底爲我國準備積極防禦的有遠見的工業化政策，斯大林對戰爭經濟底英明領導，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集體農民和知識階級底獻身勞動。蘇維埃工業逐年邁進，不斷地改進軍事武器和供應武裝部隊以偉大攻勢作戰（結果完全打垮敵人）所需要的數量日增的武器、彈藥和裝備。

沃氏詳述了戰爭生產發展底過程。

勝利底主要兵工廠是在我國的東部。一九四二年烏拉爾的戰爭物資產量爲一九四零年的五倍多，一九四三年的產量爲一九四零年的六倍。在西部西伯利亞這種增加甚至更爲顯著；一九四二年爲二十七倍，一九四三年爲三十四倍。在沃爾加地區則各爲九倍和十一倍。

蘇維埃工業不僅逐年增加供應消滅敵人的武器，並且供給更加有效與完善的軍需物資：火箭砲彈

和火箭砲、頭等重砲和高射砲、強大的現代坦克、快速飛機、攻擊機、重迫擊砲、連射機槍、衝鋒機槍和自動步槍。

應該指出：在與希特勒德國作戰結束時，蘇軍（比戰前）有四倍那樣的師團、五倍那樣的火箭砲、十五倍那樣的坦克和五倍那樣的飛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爭奪柏林的最後一戰中，蘇方使用了四萬一千門大砲和迫擊砲，八千四百架飛機和六千三百餘輛現代穿甲坦克。

「所有這些勝利的武器——都是用蘇維埃人民底手、腦和勞動做出來的。希特勒德國被在蘇維埃武器和蘇維埃戰爭機器幫助下的蘇軍所粉碎。」（原書第八十七頁）

儘管我國某些最豐富的耕作地區被敵人佔領，但社會主義的農業保證供給軍隊與城市居民以糧食，供給工業以原料。這乃是集體農莊制度底力量之一種反映，此制度已使蘇維埃農業變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最機械化和多產的農業。這也大部分由於蘇維埃政府增加東部各區在全國穀物和其他農產品產量中的任務的遠見政策。蘇維埃農民生底愛國主義表現於高度的社會主義紀律、集體農莊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及代替千百萬參軍的集體農民生底新耕作人員尤其是婦女的應徵。

勝任其任務並滿足戰場和工業底一切需要的鐵路系統底英雄工作，構成蘇維埃戰爭經濟史中最光輝的史頁之一。

沃氏生動地論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各種好處。它們不僅見之於為戰爭及滿足戰爭迫切需要而迅速與有系統的經濟轉變上，且見之於保持穩定的工資水平和某些基本食品與消費品底固定價格上，亦見之於通貨底相對穩定及財政制度底穩固和順利施行上。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戰爭經濟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戰爭經濟恰成一完全的對照，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經濟底標誌是：伴隨工人階級及一般勞動

人民日益增加的貧困的壟斷利潤底不斷增長、通貨和國民財政底脫臼、通貨膨脹和高漲的物價、投機和非法牟利的盛行以及絕大多數人民日益貧窮。

社會主義戰爭經濟底成就乃是計劃經濟底成就，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底規律之一。計劃經濟乃是具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不能想像的推動力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底一種生動反映。

「擴大蘇維埃戰爭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便是社會主義國家；另一個推動力是由布爾塞維克黨——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所領導的蘇維埃人民底英雄勞動。在蘇維埃經濟中，人民底主動性被動員起來去完成國家計劃，且每一個工人底勞動最後是服從這一目的的。蘇聯經濟發展的國家計劃，一貫是抱着一個確定的目標，這個目標是社會主義國家為特定時期規定下的。」（原書一百四十四頁）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計劃底主要特點如下：第一、社會主義計劃底效果是來自蘇聯各民族底積極的創造的主動性，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以及蘇維埃政府的。沒有這一日常的建設性的主動，該計劃祇能是一些死的數字之堆積。第二、國家計劃底效果來自這一事實：即它為完成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所規定的總的任務——為鞏固社會主義及保持蘇維埃經濟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及在愛國戰爭中為滿足戰爭經濟底需要而動員了國家底一切物質源泉；第三、蘇維埃經濟計劃底成功是由於勞動力和物資底適當分配，是由於在完成其計劃中如果任何部分落後而有可投入缺口的後備之存在，是由於生產和分配之間及生產和運輸之間的正確的平衡。

該書說明計劃性在蘇聯是怎樣為社會主義利益而利用生產和分配的各種經濟規律，包括最基本的規律：生產成本和運銷費用的規律——價值底規律，因其在蘇維埃經濟中已被改變。

沃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蘇維埃經濟所造成的損失和破壞作了詳細的分析。直接和間接的破壞是如此浩大，以致遭受同樣情形的任何其他國家勢必降為二等國家。祇是社會主義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所提供的有利條件，祇是蘇維埃制度底巨大優越性使我國能夠（儘管有戰爭造成的破壞）仍為一大強國，能夠加強其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及堅定而有信心地着手恢復並向更大的經濟繁榮前進。

於把蘇聯在經濟恢復中的進展和正陷於被美國壟斷分子（在「援助」的偽裝下）奴役危險中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戰後情形加以對照時，沃氏說道：

「蘇聯底社會主義經濟曾經是與仍然是獨立於資本主義世界之外，並按照它自己底規律在發展的……。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是建築在由生產手段底社會主義所有而來的對外貿易底獨佔之上的。所有願意與蘇聯發展經濟關係的人應該記住蘇維埃經濟底這些特點。」（原書一六六——六七頁）

沃氏於駁斥認為資本主義競爭是唯一的經濟原動力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時，說道：

「在蘇聯，資本主義競爭已被廢除，可是蘇維埃工業却比所有其他國家更加高的速度在發展着。那末對發展是有着其他和更加強大的刺激物；蘇聯各民族底日益增長的需要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日益增長的資財。其他強大的刺激物是：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競賽及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對工人的獎酬制度。」（原書一七五——一七六頁）

對世界法西斯主義和世界侵略底主要巢穴之摧毀，對蘇聯來說不僅是個軍事上的勝利，而且也是

個經濟上的勝利。在沃氏底書中精闢地闡述了這一斯大林命題。

蘇聯的這一經濟勝利要歸功於社會主義工農國家底性質，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連同其計劃性發展底規律）底優越性及工農和知識分子們底英雄努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希特勒德國是比以前歷次戰爭中的德帝國主義更加強大，更加狡猾和更有經驗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強迫幾乎整個歐洲底生產力和其在掠奪中的同謀者們底相當大的軍隊為其服務。然而法西斯德國失敗了，因為她碰了一個新的和強大的力量——蘇聯。在這空前的決鬥中，蘇聯是勝利了。由此看來，斷言希特勒德國的覆滅是其「經濟枯竭」底結果該是多麼荒謬。這種緊跟英美宣傳而來的斷言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底各種好處不僅在戰爭底嚴酷考驗中被生動地證明了；它們現在且作為迅速與成功的解決蘇聯在戰爭結束後所碰到的各種巨大問題的基礎，沃氏簡短但極突出地概述了社會主義經濟戰後重建底方針。

沃氏於提到由戰爭過渡到平時，說道：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一過渡通常招來危機和大批失業，正是蘇維埃經濟底這種可慶和固有的特點使戰後重建完全杜絕了危機與失業。」（原書一七七頁）

沃氏研究了蘇維埃國家於計劃其戰後經濟重建中所規定的目標。這些目標包括：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中的新的適當關係；各部門中勞動力和基本資本及營業資本底相應的再分配；轉變相當大部份的戰爭工業底生產設備去製造和平物品；因軍費減縮的結果，為經濟目的而增加的累積；人民消費底較高水平。在達到這些目標中，共產黨——蘇維埃人民底領導力量由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和戰爭經

濟時期底巨大經驗及在國民計劃經濟中所得到的長期經驗武裝起來。

恢復並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戰後五年計劃，已成為蘇維埃人民把精力集中其上的戰國綱領。蘇維埃愛國主義底創造力量已在以四年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全國運動中被輝煌地證明了。這一口號燃起了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們底熱情。該計劃底頭兩年結果已經證明：這個任務是一個行得通的任務。

沃氏對資本主義國家中所作的計劃企圖之分析是極端有趣的。他指出：這些國家中這種對計劃性的瘋狂愛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週期性反覆發生的工業危機的教訓來的。但是在蘇聯，計劃性是建築在生產手段公有底堅固基礎上，在這兒，計劃性乃是這個國家底規律；在資產階級國家中：生產手段是私有的，計劃性不過是一種沒有任何實際經濟力量支持的虛誠願望而已。

沃茲涅森斯基列舉美國全國資源計劃局（該局在一九四一—四三年期間曾擬製一戰後國家重建的計劃）底命運，作為一例。由於無上權威的壟斷集團不喜歡該局底工作方針，該局於一九四三年遂被迫完蛋大吉了。

沃氏講到美英人民驚懼地注視着他們的戰後前途。他提到大事吹噓的卑維利治計劃，並使人信服地證明：該計劃所達到的只是「擴展貧困至英國工人底整個一生」。（原書一八七頁）

蘇聯的勞動人民自然沒有理由來羨慕這一「廢除貧困」的計劃。

隨着戰爭的結束，蘇聯各民族繼續其中斷了的向完成建設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及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進軍。他們正向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這一主要經濟任務底解決前進。在這個向前的進軍中，蘇維埃人民不能不記住戰後國際形勢中底這些特徵。

「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存在一天，我們就必須枕戈以待。」（原書一九〇頁）

x

x

x

現祇希望這本關於蘇聯戰爭經濟的書，不僅要在蘇維埃讀者中，而且要在外國的讀者中得到廣泛的傳佈。該書所包括的事實及其理論性的結論對所有急於理解世界發展階段底重大問題的人將是有用的；——在這個階段中，資本主義底危機愈來愈尖銳，而社會主義與民主底力量愈來愈強大。

（堅博譯自「新時代」第五期——一九四八，一，二十八。）